

蕭子顯 謝應芳 孫慎行  
于敏中 趙翼 洪亮吉  
孫星衍 李兆洛 劉逢祿  
吳定良 張志讓 孟憲承

# 社会科学家中的

常州人



芮逸夫 史良 凌純聲  
謝國楨 李公樸 程滄波  
繆鉞 惲逸群 狄超白  
餘紀忠 徐復 劉大中

主編◎徐纓



# 编委会

社会科学家中的常州人

The Social Scientists in Changzhou

主任：徐 纓

委员：丁 一 陈满林 叶英姿  
张步东 罗志平

主编：徐 纓

副主编：丁 一 陈满林 罗志平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領風騷數百年

——  
清代常州詩人趙翼

# 目录

社会科学家中的常州人

The Social Scientists in Changzhou

序 ..... 1



梁代史学家萧子显 ..... 1



无神论者谢应芳 ..... 4



明代理学家孙慎行 ..... 8



《四库全书》总裁于敏中 ..... 12



清代史学家、大诗人赵翼 ..... 17



历史学家和人口论创立者洪亮吉 ..... 22



清代经学家、文学家孙星衍 ..... 27



清代史地学家李兆洛 ..... 32



今文经学派重要奠基人刘逢禄 ..... 35

# 目 录



中国人类学奠基人吴定良 ..... 38



新中国第一代大法官张志让 ..... 43



现代教育家孟宪承 ..... 48



人类学、民族学家芮逸夫 ..... 52



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史良 ..... 57



中国民族学研究鼻祖凌纯声 ..... 62



明清史研究大家谢国桢 ..... 67



社会教育家、民主斗士李公朴 ..... 71



抗战宣言《告全国军民书》的执笔者程沧波...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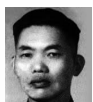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史学家缪钺 ..... 81

# 目录

社会科学家中的常州人

The Social Scientists in Changzhou



新闻战线的号手恽逸群 ..... 85



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狄超白 ..... 90



《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 ..... 95



一代语言学宗师徐复 ..... 99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吴泽 ..... 103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刘大中 ..... 107



法学教育家王健 ..... 112



中国道德心理学开拓者李伯黍 ..... 116



博学大师、语言学家蒋维崧 ..... 120



文艺理论家钱谷融 ..... 125

# 目 录

社会科学家中的常州人



近代史与经学专家汤志钧 ..... 130



社会法学奠基者史探径 ..... 135



经济学家周叔莲 ..... 139



市场取向改革的倡导者、经济学家吴敬琏 ... 144



古典文学研究大家袁行霈 ..... 149



经济运行机制理论专家洪银兴 ..... 153

后 记 ..... 158



# 序

人文社会科学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核心引擎。在绵延的历史长河里，在浩瀚的社科领域内，一批又一批常州才俊好似群星，闪耀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教育、法律、心理等众多学科的苍穹。《社会科学家中的常州人》从悠久的社科历史长卷中，采撷其中的部分杰出代表，记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事业成就，以及他们身上流淌着的常州人文的血脉。这些，都是常州宝贵的财富。

他们秉承了常州特色的人文精神，弘扬常州人好学、勤勉、博学的传统和敢为、实干、求精的精神，探索追寻科学形成的途径和规律，成为一代又一代社会科学领域显赫的名家。

他们展现了常州气派的人文担当，以中华民族大利、中国社会大局为己任，在民族兴亡的重大关头敢于挺身而出，为真理鼓与呼，将小家得失、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他们涵养了常州风格的人文情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社会科学的精髓教化四方、传承后代，为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积蓄能

量、呐喊助力。

一个城市的社科水平和人文素养，标志着她的整体理论功底、精神面貌、思想境界及文明程度，也是这个城市的实力所在、魅力所附、潜力所系。常州的社会科学家用他们的经历、成就以及人性的光辉，为常州城市精神树立了高耸的人文标杆。记述他们，就是为了寻根溯源，激励后人奋发有为、追求更高境界，进一步彰显新时期常州人的时代风范。

思昔抚今，处于大变革、大发展时期的常州新一代，有着自己的梦想、也有着自己的使命。跨步在现代化建设之路上的常州，为实现梦想、肩负使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希望全市上下以常州社会科学家们为典范，树立自信、勇于担当、自觉作为，坚定不移地向着谱写“中国梦”的常州新篇章的目标奋力前行。

中共常州市委书记

2013年6月5日



## 梁代史学家萧子显

萧子显（489—537），南朝梁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出生于南兰陵（今属常州），是齐高帝萧道成子孙，豫章文献王萧嶷（yí）第八子。他所撰写的《南齐书》，是现存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

萧子显自幼聪慧，7岁封宁都县侯，长大后由于才华出众、举止优雅，深得梁武帝萧衍的赏识，得以接连升迁，从仁威记室参军、司徒主簿而升至国子祭酒，加任侍中，权重一时。

梁大同三年（537），萧子显出任仁威将军、吴兴太守，任职不久，病逝任上，终年49岁。

萧子显一生酷爱史学。他撰写了5部历史著作：《齐书》60卷、《后汉书》100卷、《普通北伐记》5卷、《贵俭传》30卷以及《文集》20卷。其中《齐书》（后改称为《南齐书》），都是他20岁至30岁期间完成。他写史可谓当代人写当代史，对南齐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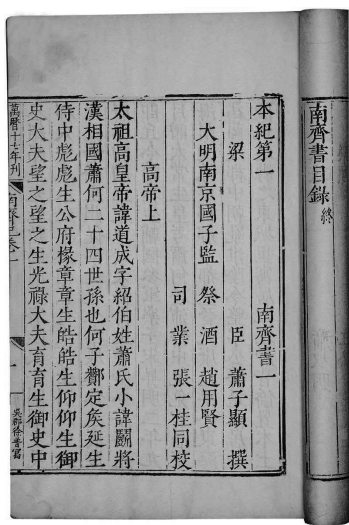
《南齐书》

资料的收集与掌握比一般史家容易，在取材上比较真实可靠，没有后朝贬前朝的通病。

《南齐书》部帙不大，包含的年代又很短，竟然撰就了8篇志，确实难得。该书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在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的弊病。这样既可以突出主要人物，节省篇幅，避免重复，又不至于出现重大疏漏而留下遗珠之憾，这也显示了萧子显在历史表述上的才华。在撰写中，他不直接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前后史事的对比来揭示人物的品格。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说：“此数传皆同一用意，

不着一议，而其人品自见，亦良史也。”顾炎武称这种写历史人物的方法叫做“于序事中寓论断”。

《南齐书》保留了不少珍贵的材料，如《沈文季传》中保存了唐寓之起义的史料和中国古代科学家祖冲之的生平及成就；在《竟陵王萧子良传》中，记载了赋



《南齐书》

税、徭役、水利、垦田等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南齐书》成为研究南齐二十三年历史的重要文献。

除史学外，萧子显在文学上也颇有成就，他提倡文学的“新变”和创作的“委自天机”（即灵感）。这是他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和经验，在当时也是求新求变的创新之举。他针对流行的各种文学体裁，人如果墨守成规就难以企及前人的问题，他认为文学要发展，就必须有所变化，另辟新境。他强烈反对沿袭模仿，坚持创作要有个性。对创作的灵感问题，他说：“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是说各人性格、爱好不同，诗的风格必然各异，他断言：“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惟来，勿先构聚。”意谓灵感之来，非苦思所得，而是有了感触，即自然而来。在文学批评史上，萧子显有独特的贡献。

史学之外，萧子显还是南齐时代皇族中颇有成就的作家、诗人。他作诗以才思敏捷见长，像《玉台新咏》中所收的一些艳诗，在梁陈诗中较有影响。

## 无神论者谢应芳

谢应芳（1295—1392）。他自幼好学不倦，饱读诗书，对文、诗、词、曲无所不精，尤其热衷理学（哲学），以道义名节勉励自己，把“道义”当作人生处世最重要的追求目标，一生不参加科举考试。他认为，读书不是为了入仕做官，而是为修炼思想境界、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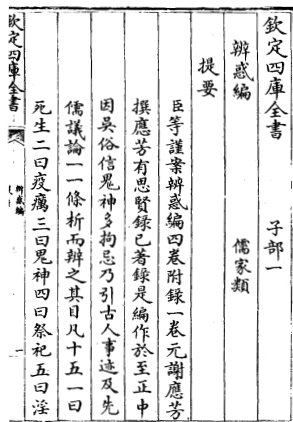


谢应芳

书育人。40岁后，他远避都市尘嚣，到荒郊野外的白鹤溪（今邹区鹤溪河）筑一小屋授徒为业，参与编纂中国最早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元朝末年，朱元璋部率兵攻打常州，谢应芳携全家逃至苏州等地避难，因“德望重于东南”和才识名重，被吴中名士争抢聘为塾师。朱元璋平定群雄建立明王朝后，谢应芳回到故里，在芳茂山（横山）筑一茅庐，取名“萧然”隐居。

谢应芳一生著作等身，曾著有《怀古录》《思贤录》《洪武常州志》等大量传世之作。其中《辨惑编》



《辨惑編》

是一部系统全面反对和清算神学迷信、充满无神论思想的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重要著作，其核心思想是反佛、反道。他认为佛、道两教灌输人们诵经念佛，追求长生不死，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该书是谢应芳研究理学理论的精华，在明初反响极大，后世论及元明之际社会思想史、哲学史，无不提到这部有影响的著作。

宋元两朝，风水、巫术、相面等封建神学迷信思想盛行，老百姓深受其害。谢应芳立志匡正世俗，对异端邪说、神学迷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从历朝古书中摘录有关反对鬼神迷信文字论述中引据论证，对异端邪说进行批驳、澄清，以正视听。

谢应芳认为，人的生死并不神秘，是一种自然现象。生是人之始，死是人之终。生就是气聚，死就是气散，绝对不会人死后灵魂还在的。对疾病，谢应芳认为这都是受巫覡（xí）所惑，并主张有病求医服药，解决病源的最好办法是求医服药。他告诫百姓，求神驱鬼不但无知，反会误事。对相面、看风水等迷信，谢应芳更

是大力批驳，一针见血。他认为巫覡卜筮自称能替人祈祷神明、降福消祸、逢凶化吉等，都是骗人的把戏。这种采用进而能攻、退而能守的两全说法，对迷信思想严重的人最有效，是巫覡骗人惑众的绝招。

对于相面和风水，谢应芳同样也给予了批判。他认为，根据人的面貌、体态或生辰八字来推测人的吉凶、祸福、生死是不可信的，吉凶、祸福主要取决于人的行为和生活环境。至于人死后下葬、建屋要请风水先生“把脉”等行为，他认为这更是荒诞无稽的迷信，不可相信。

谢应芳在揭露世俗迷信危害的同时，对神仙方术、佛教迷信一起进行批判。他斥道、佛的相关论述为异端邪说，认为道家讲究所谓服食丹药，追求长生不死和修炼成仙，结果不少人妄求成仙，或出航远洋寻找仙都，或希冀长生不老，吞食灵药，结果不是葬身大海，就是毙命身亡。他告诫人们，世界上根本没有神仙，也没有长生不死的灵丹妙药。对佛教宣扬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谢应芳认为那都是不靠谱的。他揭露佛教用坐谈空寂、鬼神迷信欺骗人们建坛设斋、烧香念佛、祈求成佛、进入天堂等行为，不仅浪费钱财，还会荒废正业。对佛教倡导因果报应，他举例批判说，梁武



帝（萧衍）虔诚信佛，结果亡国，饿死台城，为什么没有得到好的报应呢？

谢应芳的无神论哲学思想，在元明之际首屈一指，还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明代理学家孙慎行



孙慎行

孙慎行（1565—1636）。他是文武全才唐荆川的外孙，深受外祖父影响，自幼酷爱读书。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考中进士，殿试第三名，先后任翰林院编修、礼部侍郎，代理尚书。在任期间，他曾数次请假回常，闭门读书，深究理学或在东林书院讲学，为东林党重要掌门人之一。

孙慎行是明代重要的理学家。宋代以来，理学家把“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强调“二元论”。孙慎行认为“性”和“气”实是一回事，强调“性善”一元论，坚持认为只有性是天命注定的、是善的。这一观点也是他理学思想的独创。在功夫论上，孙慎行与宋儒相一致，“戒惧慎独”学说尤胜一筹。所谓“戒惧慎独”，就是要提高个人的修养，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上要“戒惧”、下功夫。“慎独”是指在情操、修养、自律、坦荡上要有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不做任

何有违道德信念的事。孙慎行认为讲理学的人，最讲究的是慎独功夫，如果要做君子，就应该“终日戒惧慎独”。他的这一思想至今为人借鉴。

孙慎行的理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庸慎独义》等书中，最大的贡献是形成了独创的慎独功夫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影响了包括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刘宗周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同时也使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中国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有“云雾为之一开”的感觉。

孙慎行的理学思想影响深远，对东林学派思想的形成不可没。他在东林书院讲学，影响了一大批人。理学家、文学家刘宗周曾说：“东林之学，涇阳（顾宪成的号）导其源，景逸（高攀龙的号）始入细，至先生（孙慎行）而集其成矣。”

东林学风倡导“主敬”（倡导道德修养方法，以高攀龙为代表）与“慎独”（以孙慎行为代表）道德修为功夫，最大的特点是关心时事、讲求实用、知行并重，以经世致用为导向，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反对王阳明“空言”研究，不着边际，对明王朝宦官乱政，朝政腐朽、没落、衰弱有针对性，为明清之际的实学之风开启了务实的方向，树立了一种全新的伦

理思想。

孙慎行为官刚正不阿，清廉正直，在官场上有两件事最值得称道。

一件是直谏神宗皇帝。神宗皇帝朱翊钧与皇后无子，临幸宫女王氏，生长子朱常洛，王氏被封为王恭妃，接着又与妃子郑氏生了第二个儿子朱常洵，郑氏由此被封为贵妃。按祖训规矩，应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可郑贵妃常吹枕头风，想叫皇上立自己所生的朱常洵为太子，神宗也比较赏识这个儿子，动了违背祖训之念。孙慎行等大臣带头上奏，强烈反对，使郑贵妃的阴谋未能得逞。万历四十二年（1614），朱常洵被封藩洛阳为福王，郑贵妃让儿子赖在京城不走，索要庄田4万顷，孙慎行又连续十多次上奏，要求下旨让朱常洵离京。事成后，孙慎行深知得罪权贵，四次上奏要求回籍苦读史书获准。

另一件是“红丸案”。万历四十八年，神宗驾崩，太子朱常洛接位，郑贵妃极力“讨好”，进献美女。朱常洛因好色过度，29天后就一病不起，原郑贵妃身边心腹太监、管御药房的崔文升赶快送药恶补。接着鸿胪（lú）寺丞李可灼又献呈红丸，结果这位皇上吃后第二天就驾崩。朱常洛长子熹宗朱由校接任皇位后，下诏孙

慎行赴京任礼部尚书。孙慎行到任后便上奏，怀疑郑贵妃害死朱常洛，要求严惩李可灼等。此案始称为“红丸案”。16岁的朱由校性格软弱，交由宦官魏忠贤处理，仅将李可灼作流放处理。孙慎行看到宦官乱政，朝政颓废，大所失望，上任一年多时间，再次称病，回常州读书讲学。以后魏忠贤排除异己，陷害忠良之风越演越烈，阉党霍维华上奏，全盘推翻“红丸案”，指孙慎行为罪魁祸首。加上孙慎行在东林书院讲学时抨击阉党，早成了魏忠贤眼中钉，遂被流放宁夏。后幸朱由校短命（22岁），阉党被接任的思宗皇帝朱由检铲除，孙慎行才获赦。



孙慎行、孙星衍故居

## 《四库全书》总裁于敏中



于敏中

于敏中（1714—1780），金坛人，出身于诗礼簪缨世家。他幼承家学，5岁受母亲启蒙。其母课读甚严，常立在窗下屏息静听其读书。15岁江南乡试中举，赴京会试落第后，另择师问业，研读《四书》《十三经》。20岁时，博通经史百家，阴阳历律诸书，旁及佛道之说。乾隆二年（1737）丁巳恩科会试，擢（zhuó）进士第一，时年23岁，是当时清王

朝最年轻的状元，且与伯兄于振并称“兄弟状元”，为金坛科举盛事。

于敏中少年夺魁，春风得意，仕途一帆风顺，任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要职。他倡导文治天下，满腹经纶，经世治国，文思敏捷，通熟掌故，文章冠绝一时，书法清秀洒脱，朝廷的诰命、制敕、传记、诗章、典要多出其手。故宫庆华殿

至今留有其亲笔所撰之楹联：“四壁图书是今古，一庭花木验农桑。”

于敏中身居高位，一心想推行文治天下，著书立说，被时人称为“一代作手”。在浙江任职时，他游遍浙地，采集史料，撰《浙程备览》。寻访天一阁，得南宋郑樵《通志略》全书，研治考证，编为52卷，作序一章，重刻发行。乾隆十五年（1750）皇帝驾幸上书房，听于敏中讲授北宋王黼（fǔ）著的《宣和博古图》，有所触动，令于敏中与梁诗正描绘内府珍藏历代古钱567枚，撰书《钱录》16卷。乾隆二十六年（1761），朝廷举行孝圣宪皇太后七十寿诞庆典，于敏中上殿朝贺，奉旨撰写《国朝宫史》，汉译《钦定满州祭神祭天典礼》，撰写《钦定满洲源流考》。乾隆三十二年，高宗在摘（chī）藻堂御览明大学士李东阳撰写《通鉴纂要》，见其引文多有舛（chuǎn）误，召于敏中、刘纶等，重行精审，增修《历代通鉴辑览》，每卷修成，高宗御批卷首，历代罕见。

于敏中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促成并亲自领导《四库全书》的编纂。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学政朱筠（yún）上疏《开馆校书折》，奏请搜辑《永乐大典》中佚书。当时内阁大学士刘统勋认为此非政务要事，于敏中则深为



《四库全书》

赞赏，并据理力争，并受命主持其事。随后乾隆帝下令，在《永乐大典》中选择一些分量厚重的典籍进行校勘付梓流传，剩下的也录存汇辑，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图书，统一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这样，一道普通的征书谕旨便因缘际会，引发了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在全国展开。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库全书》馆正式开馆，总裁最高，副总裁大都由皇室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同年三月十一日，总裁于敏中和副总裁刘纶、刘统勋等上奏说，为了避免编纂过程中有所遗漏，水平参差不齐，请将纂修官纪昀、提调陆锡熊任为总办（即总纂）；添纂修人员10名，任命对典籍有研究的姚鼐（nài）、程晋芳、任大椿、汪如藻、翁方纲为纂修官，任命能考订古书原委的余集、邵晋涵、周永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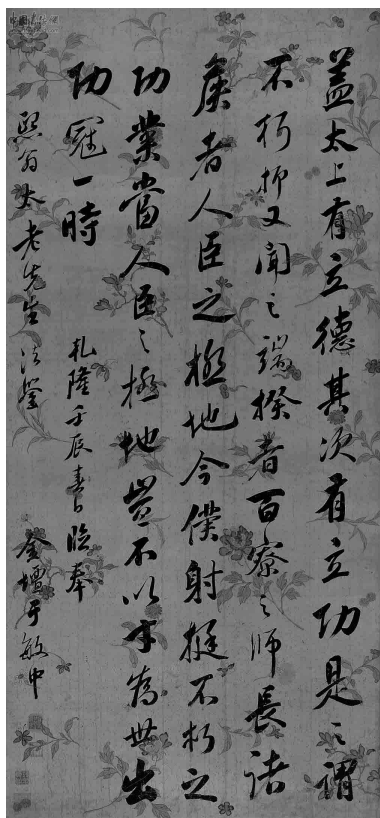
戴震、杨昌霖为分校官。乾隆准奏。这一奏折，彰显了于敏中卓越的胆识、宽阔的胸怀和慧眼识才、任人唯贤的才能。

不久，乾隆帝考虑自己已63岁，希望尽早看到开馆修书的成果，下令同时编纂《四库全书荟要》，汇选重要典籍及必备图书于一堂，以便早日观览。这样既能取精，又可求速。为了保证《荟要》编纂速度和质量，又命于敏中、王际华主持其事。于敏中事务繁多，既在军机处办理军务，又兼任文稿审核，还多次随圣驾去木兰围猎，但他十分重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对《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的核心问题，提出了褒贬原则、具体标准和分类等建议。为不出舛误，于敏中与总纂官陆锡熊通函论书56封，《四库书札》刊行于世。在于敏中等人的努力下，《荟要》第一部于乾隆四十三年五月顺利完成。此书后又抄写一部，共存两部。现一部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一部咸丰十年（1860）毁于英法联军之手。

于敏中筭（bì）路蓝缕、胼（pián）手胝（zhī）足、聚沙成塔，在《荟要》完成后不久即病重，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病逝于任上。

《四库全书》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

书集成，几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主要典籍，被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大典。其编纂历时十多年，聚集4000多名饱学之士和文人学者。称于敏中为《四库全书》“第一人”，实至名归，并不为过。



于敏中手迹

## 清代史学家、大诗人赵翼



赵翼

赵翼（1727—1814），祖先是开国皇帝赵匡胤次子赵德昭。元泰定二年（1325），高邮州参军、赵德昭第十一世赵孟堙（yīn）路经常州政成乡，遇异人称此地风水很好，可子孙繁衍、家财万贯，便选择西盖村（现横林赵家塘）定居，就此成为赵氏迁常始祖。赵氏在常再传十四世到赵翼父亲赵惟宽时已衰落，至赵翼复

兴腾达，成为常州望族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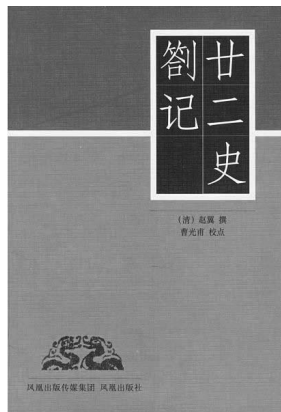
赵翼从小聪明，12岁能制举文，19岁考取秀才，23岁投奔京城亲戚处谋生，后被刑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刘统勋延至家中纂修《国朝宫史》。24岁考中举人，得到主考官汪由敦赏识。乾隆十九年（1754）考取内阁中书，后入军机处。当时朝廷正在征讨西北准噶尔叛乱，公务繁忙，凡汉字谕旨及议奏诸事，都由赵翼起草，深受军机大臣傅恒器重。

乾隆二十六年（1761），赵翼会试中进士。乾隆皇帝对前几科三鼎甲基本被军机处中书所占有顾虑，怕引发社会非议，赵翼殿试时有意变换笔迹。主考官刘墉看这张卷子，文笔极佳，很像赵翼风格，便去问傅恒，傅恒认为不是，就把这张卷子列为一甲一名（状元）。结果拆封贴，发现果真是赵翼。主考官讨论通过了鼎甲排列，呈乾隆定夺，乾隆认为江南状元够多，就问陕西是否出过状元，考官说过去有，当朝（清代）没有。乾隆就将一甲三名（探花）的陕西人王杰与赵翼对调。

赵翼中试后，先入翰林院，后外派历任广西镇安知府、广州知府、贵西兵备道等职。

赵翼从40岁开始，用了将近30年时间，撰写了一部史学名著——《廿二史札记》。为了撰写这部史书，他先后熟读、批阅廿四史3200卷，引用各种稗（bài）史、笔记4000多种，可见工作量之浩瀚。

《廿二史札记》共36卷，补遗1卷，是赵翼的史学代表作。此书与王鸣盛著的《十七史商榷》和钱大昕著的《廿二史考异》，被誉为清代最有影响的三



《廿二史札记》

大史学名著。此书采用以史证史的方法，其最大的特点在史事考证、史事史学评论和归纳比较上。在史事考证上，他认为撰史最重要的是要谨慎从事，“草率荒谬，为史家最劣”，不能因猎奇而放弃严谨，他采用以史证史方法，对《史记》《汉书》直至《明史》等历代24部正史进行整体考证，辨别史事真伪，评判优劣，考辨纠正了各史中诸多史实谬误，颇具历史价值。

史事史学评论是这部书最精彩的部分，如《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魏晋禅代不同》《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唐代宦官之祸》《宋初严惩赃吏》《金考察官吏》《元诸帝多由大臣拥立》《明乡官虐民之害》等评论，都关乎“天下之情变，古今之得失”，研究治乱兴衰的经验，为后人提供了历史经验教训。

纵向考察，横向比较，是赵翼这部书的又一个特点。他用归纳、比较发展的眼光审视历史、认识历史，显示了他对历史问题的深刻见解和创造性思维的独特功力。梁启超曾说赵翼“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这是研究方法的一种创新。有学者评论赵翼治史是“乾嘉时代甚至中国整个史学发展史上所罕见的史学”。著名经学大家和考史学家钱大昕评论札记“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日本学者评论赵翼是中国

史上最伟大的十位史学家之一。《廿二史札记》历来被推举为治史入门之书。

治史之外，赵翼还擅长论诗和诗歌创作。他论诗重“性灵”，主张与时代同步，要创新，与袁枚接近。他反对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倾向，也不满王士禛、沈德潜“神韵说”和“格调说”，认为“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赵翼在文学史上，与袁枚、蒋士铨齐名，合称“江右三大家”；与袁枚、张问陶并为“清代性灵派三大家”。



赵翼故居

赵翼一生创作近5000首诗，以五言古诗最有特色。有诸多经典名句传世，像“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等。

## 历史学家和人口论创立者洪亮吉



洪亮吉

洪亮吉（1746—1809），出生于常州城区中和桥东南兴隆里一个没落官僚士大夫家庭。他自幼好学，但科举仕途并不顺利，34岁才考中举人，45岁考中进士。早年靠教书校文、任幕僚为生，曾加入安徽学政朱筠幕中，并被一代大儒毕沅重金延聘。后历任翰林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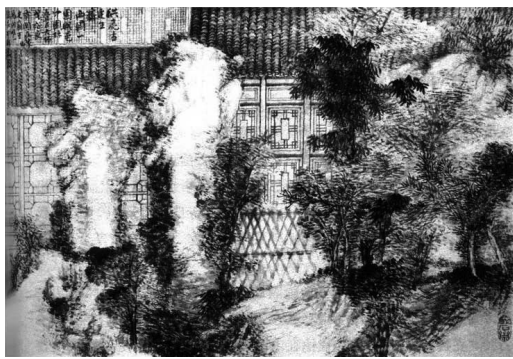
编修、贵州学政、咸安宫官学总裁等职。

洪亮吉为人耿直，忠义守信，直言世事，绝不阿谀逢迎。嘉庆三年（1798），白莲教起，民间纷乱。嘉庆皇帝“征邪教疏”，命翰林官员上疏献策。洪亮吉上疏数千言，直陈时弊。他认为白莲教是由吏治腐败引发的，征邪教必须治吏，还列举了诸多内外弊政。嘉庆帝读疏后大怒，洪亮吉不得不借弟弟病故为由，辞官归故里避祸。嘉庆四年乾隆驾崩，洪亮吉循例回京奔丧。大学士朱珪又召他出来做官，任实录馆纂修。其时，嘉庆帝虽已翦除和珅，但国家弊政依旧。洪亮吉耳闻目睹，



一腔忧国忧民之情化为一篇洋洋万言的《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并请成亲王转呈嘉庆帝。这篇切中时弊、正气凛然的上书再次激怒嘉庆帝，引来“妄测高深，意存轩轾，狂谬已极”的罪名。洪亮吉被革职交军机处和刑部会审，即“照大不敬律拟斩立决”。在架上刑具等待绑赴法场之时，嘉庆帝觉得洪亮吉上书还是出于忠君爱国之心，考虑再三后御笔批示：“从宽免死，发往伊犁。”洪亮吉从死亡线上折回，过着“百日无诗无酒”的流放生活。

洪亮吉案发后，朝廷一片冷清，无人再敢议论朝政。嘉庆帝不愿落个“拒谏饰非”的骂名，遂发布上谕说，洪亮吉的言论其实启发了他的想法，他将那些言语作为座右铭，时常观览，勤政务而远小人，时时警省。不久嘉庆帝为洪亮吉平反，下令保定将军将洪亮吉赦回原籍。洪亮吉回到故乡常州，将西圃小园修缮一新，将园内书房命名为“更生斋”，自号“更生居士”。



西圃小园更生斋

作为历史学家，洪亮吉治学严谨翔实，力求科学客观，重视考辨历史真实面貌，以达到以史为鉴的作用。他不仅精通史学和地理，还撰写有专门史学著作《三国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四史发伏》《西夏国志》《宋元通鉴地理通释》等，负责审定《历朝史案》一书。关心时政是洪亮吉治史的一个显著特点，认为学古为入官之本，前事即后人之师，是治史的重要出发点。他考察历朝兴衰，研究治政之策，褒贬人物，其意也在于此。他还反对暴虐君主统治。

嘉庆十年三月，安徽泾县知县李德淦聘洪亮吉纂修县志。洪亮吉因首次主持地方志纂修，在制订县志凡例时十分严谨。作为史家，洪亮吉重视史实清晰，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反对含糊不清，或过于笼统。尤其对人物志传，他主张各类人物都俟定论，方入志传。两年后，《泾县志》编纂完成。

嘉庆十一年二月，洪亮吉又应安徽宁国府知府鲁铨聘请，主持编纂《宁国府志》。他颇为用心，多次前往宁国实地考察查证。洪亮吉虽与知府鲁铨有同年成进士之谊，仍就编志时遇到的问题，向鲁铨写了一封很尖锐的信——《志事将竣与宁国太守及诸同事书》，提出府内县名排次、人物传记、古迹冢墓、山水形胜等十项具

体问题，以示郑重。同时，他写有《与章进士学诚书》等方志论文。

洪亮吉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人口理论。清朝中叶全国人口迅速增长，引起洪亮吉的忧虑。他在《卷施阁文甲集》中《治平》《生计》等篇指出：人口增长过快与粮食产量增加缓慢之间存在着矛盾。洪亮吉将人口增殖速度与生产发展、田地开垦、房屋住宅作了认真分析比较，得出人口增殖速度相当于几何级数，而耕田、住宅等生产、生活资料发展速度相当于算术级数。他认为，封建社会里百姓贫困，不独是人口增殖过快所造成，而且还有土地兼并、吏治败坏等社会原因。为解决人口增殖加剧的社会矛盾，他致力寻求缓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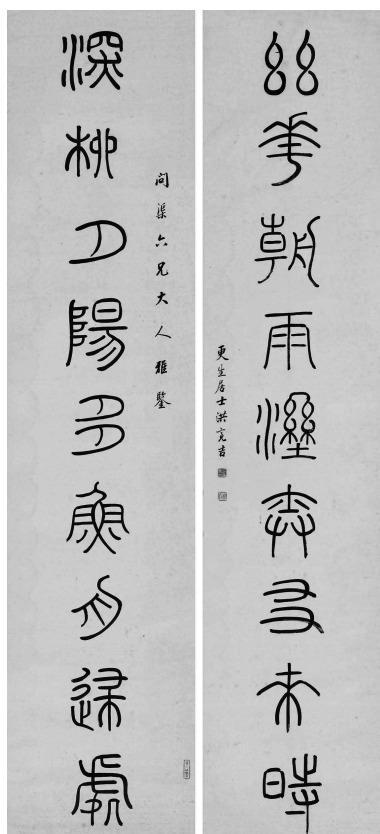
洪亮吉故居



洪亮吉纪念馆

之策，在某些方面也体现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关怀与对社会发展的关注。洪亮吉在18世纪即对我国人口增长有所警觉，确实难能可贵。他的人口学说比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早提出5年，人们把洪亮吉看作“中国的马尔萨斯”。

洪亮吉还是清朝中期杰出诗人。他自幼爱诗，受到我国古诗的良好教育与熏陶，加上天资与勤奋，写下了大量的诗篇，有诗集《卷施阁诗》《附鲒轩诗》《更生斋诗》《更生斋诗续集》等，许多诗作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洪亮吉手迹

## 清代经学家、文学家孙星衍



孙星衍

孙星衍（1753—1818），代表作品有《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和《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芳茂山人诗录》等。

孙星衍的经学成就得益于家教。父亲孙慎行为儿孙开列的必修课程中以经学为首，以训诂之法求得真解。孙星衍一生钻研辑佚、训诂，辑佚成果集中见于他的两部丛书《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他的经学研究，非常注重经世致用，这也集中体现了常州学派的特点。



《岱南阁丛书》



《平津馆丛书》

乾嘉年间，“文网”严密，因而学术研究上表现出了一种皇家霸气，缺少个性与道德准则。但在孙星衍的学术研究中，无不体现出他对道德准则和人生信条的坚毅和执着。他的诗歌创作有才气，经学的研究更有才气，用他自己的话说：“却怀知己生平语，无复才奇气尚奇。”他对“惟寻章摘句之儒，滥竽一路”颇为不满。他校勘和刻印古书的基本宗旨和原则是：可有可无的说辞和观点一律加以淘汰。

孙星衍继承了其祖先的学术传统及正直秉性。据记载，孙星衍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高中及第，授编修，和珅听说他的才华，想要让孙星衍“屈节一见”，但他坚决不肯前往。他说：“宁得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即使后来自己有机会，他因不屈从和珅的权势而未被升迁，被称为“憨翰林”。

孙星衍的正直狷（juàn）介不仅表现在对待贪官的立场上，还表现在他对待自己的良师益友袁枚的态度上。他中年转而研究经学后，因诗歌创作上略显逊色，袁枚专门致书责问他。他在《问字堂集·答袁简斋前辈书》中，客观公正地论述了诗歌与考据的关系，还委婉地指出，作为文坛领袖，说出的话要考虑影响，不然会挫伤学子的“进学之志”，并在诗歌《游随园赠袁太史七首》中说“我愧千秋无第一，避公才笔去研经”，含蓄地表达了自己从事经学的决心。

孙星衍幼年时以文学见长，青年时代，他与洪亮吉、杨伦、黄景仁、赵怀玉、吕星垣、徐书受七人经常集会酬唱，广泛交游，当时文人称他们为“毗陵七子”。他们才华横溢，意气风发，在全国很有影响，其中孙星衍、洪亮吉、黄景仁是“毗陵七子”的中坚力量，且唱和最多，往来最为频繁。

孙星衍与洪亮吉、黄景仁并称诗歌“巨手”，诗坛一致认为孙星衍的诗与黄仲则、洪稚存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与毗陵诗人交往甚多的无锡诗人杨芳灿曾称孙星衍的诗“渊如擅宏通”。

青年时代，孙星衍的诗深得袁枚赏识。据记载，乾隆三十九年（1774），22岁的孙星衍怀诗谒见袁枚，

袁枚倒履相迎，读罢其诗，不胜感慨，叹为“天下奇才”。于是，袁枚与孙星衍结为了忘年交。

孙星衍的诗大多表现他不屈的个性和孤高的人格。

“我觉天地真樊笼”、“官闲自觉疏狂称”、“我生志大不自量”。面对樊笼般的官场和世俗社会，不愿受到束缚，不愿同流合污。同时，他的诗歌还有对民生疾苦及其他社会矛盾的描写，如《乡下有饥者》《割麦词》等。

孙星衍早年诗歌创作以奇逸之气著称，诗歌风格豪迈狂放，颇有气势，有诗仙遗风，当时文人称赞他犹如李白再世，超过杜甫和韩愈。

中年后，孙星衍转而研究汉学并沉湎其中。虽然诗歌创作的成就远不如青年时代，数量也远不如以前，但诗歌风格更显心境豁达，荣辱名利更为看淡。孙星衍潜心研究经学，通晓经史、文字、音训、诸子百家等，治学广博，著作颇丰，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吴鼐（nài）编辑的《八家四六文钞》选择了乾嘉之际全国最著名的八家骈文高手，其中就有孙星衍。

孙星衍除了在诗歌创作、经学研究上值得人们称道外，在感情生活上亦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他的夫人王采薇才华出众，尤其擅长诗歌与围棋。



据孙星衍说，结婚后夫人让他填词、下围棋，他都不会，后在夫人的教导下学会了填词，但围棋始终没有学会。在那样一个时代，敢于说出自己不如夫人，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孙星衍夫妇可谓伉俪情深，两人经常闺房唱和。他的好友黄景仁就有一首赞美他夫妻情深的诗：“孙郎下笔妙心孔，百炼枯肠泻真汞。寄我新成《病妇诗》，不特才豪亦情种。”可惜王采薇24岁就离世了，此后孙星衍终身未再娶妻。在那个封建时代，男人别说是丧妻再娶，就是妻妾成群也是无可厚非的，就连当时的文坛领袖袁枚都有好几个小妾，甚至还有狎妓。但孙星衍却坚持为妻子守节，并搜集整理妻子的遗诗辑为《长离阁集》，还请袁枚写墓志铭，孔广森写序。

孙星衍的文学创作和经文研究，体现了清代常州学派的特点并加以融通。常州学派包含了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孙星衍巧妙地把两者合二为一。他既是学者又是诗人、骈文家，在他身上，文学和经学变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诗歌、文学的才华使得孙星衍的经学著作充满了文采，而经学的传统又使他具备深厚的学力，作诗讲究学问根柢，避免了诗歌创作中空疏浅薄的弊端。

## 清代史地学家李兆洛



李兆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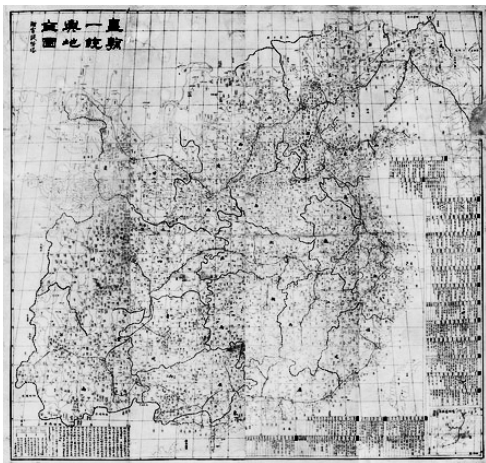
李兆洛（1769—1841）。

他出生在阳湖县三河口一家书香门第，其父李徵兰是阳湖县秀才，家有藏书5万卷。李兆洛自幼记忆力过人，16岁参加县试；18岁从乡里廪贡生吕岳学习三年；21岁转入常州龙城书院深造，成为该院山长、著

名经学家卢文弨的高足；嘉庆十年（1805）中进士，授安徽凤台知县。嘉庆十九年，李兆洛父亲逝世，他再三辞官，由于官事羁留，直到嘉庆二十一年才返里居丧葬父，从此告别政坛。

学界普遍认为，清代史地学突出的贡献在于历史地图集的编制，以及经纬绘图法的应用。李兆洛却在这两方面均有突出成就。他根据董方立的原图，于道光十二年（1832）编绘成《皇朝一统舆地全图》。他将零散的董氏原图改汇成总图，并标注以经纬度，使整幅图“舒之为屏幅，卷之为册页”，即便观览，又使内府舆图公诸于世。该图的最大特点是将画方网格与经纬网格同时

绘在同一幅图上，是经纬与计里画方并存于同一幅地图中的代表作。



《皇朝一统舆地全图》

李兆洛编制的地图集，除《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大清一统舆地全图》《皇朝舆地韵编》《海国纪闻》《海国集览》外，还有《历代地理沿革图》《历代舆地沿革图》《历代沿革图》等。其中《历代地理沿革图》对清末杨守敬编绘《历代舆地图》启发甚大。他还历时数年编成《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仿《汉书》以下各史《地理志》中地名，注历代所属州、郡及今地所在，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名辞典和查考古代地名沿革变迁的重要工具书之一，便于治史者翻检。

李兆洛既是清代著名的史地学家，又是卓有成效的方志学家。他以编修方志为济世工具，明确指出：纂修方志有益于“政事”和“教化”，方志可以了解一地历史发展的盛衰、地势的险易、丘陵山谷的变迁、政治的

得失、风俗的淳薄，用这些来教育人们，校正乡民的风俗习惯，往往阅读地方志可以知晓天下，其作用非常巨大。李兆洛在安徽凤台任上，遍历全县，亲临全县各地作调查研究，并在政务之暇，用三年时间编纂了《凤台县志》。

道光十九年，常州知府黄冕创修府志，特聘李兆洛为总纂。年逾古稀的李兆洛，为乡邦修志盛举欣然应聘。修志局设在常州龙城书院，他往返常澄之间，后因精力不济辞去暨阳书院山长之职专修方志。他特订体例，令各县依此先辑县志，为郡志作张本。并推荐武进、江阴、兴化一批地方知名学者参与各县修志，效果显著。

李兆洛治学坚持学以致用。他继承明末清初顾炎武博学致用相结合的学风，成为清代道咸之际“经世致用”的思想先驱。魏源称他为“近代通儒”，龚自珍则称他是：“江左晨星一炬存，鱼龙光怪百千吞。”他不遗余力地校勘多种文献，有《邹道乡先生集》《旧言集》《江干香草集》等数十种，还校勘了顾炎武的《日知录》和胡承诺的《绎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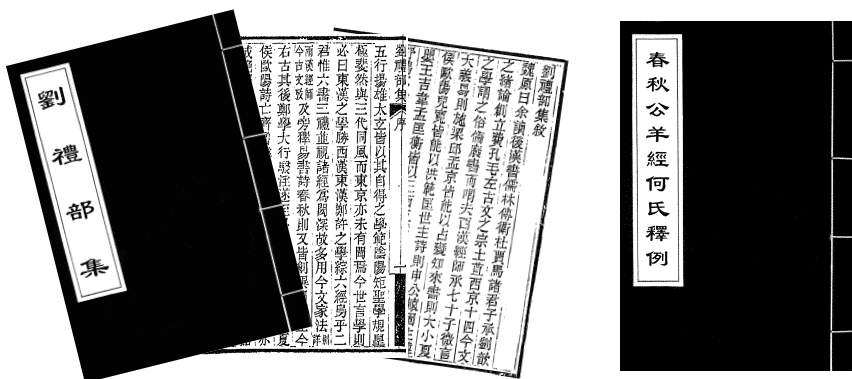
## 今文经学派重要奠基人刘逢禄

刘逢禄（1776—1829），清代今文经学派的重要奠基人，开创性提出“变”的思想，在当时惊世骇俗，振聋发聩，启发康梁变法，成为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思想家。

刘逢禄家学渊源，是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纶之孙，又是礼部侍郎、今文经学派创始人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之父刘召扬，曾应乾隆皇帝南巡召试，得乾隆亲置第一，曾主湖南、陕西、山东讲席。母亲庄氏熟通经史，少年刘逢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1岁时，刘逢禄随母亲归省，外祖父庄存与问其学业，刘逢禄对答如流，庄存与高兴地说：“此外孙必能传吾学！”在外祖父“传学”的期冀下，刘逢禄逐渐走上了公羊学的治学之路。舅父庄述祖对刘逢禄非常赞赏，对他的影响也很大，有“刘甥可师”之誉。据说庄存与本意深研公羊学，见到刘逢禄的成就后，竟然放弃了。刘逢禄39岁时考中进士。

刘逢禄一生学识广博，著述宏富。曾授龚自珍《公羊春秋》之学，龚自珍赞叹刘逢禄时称“东南绝学在毗陵”。他的主要著述是《刘礼部集》十二卷。他对《周

易》《诗经》《尚书》等都有阐述，其学遍涉群经，以《春秋》为重，以何休公羊学为本。其春秋学相关著述有：《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公羊何氏解诂笺》一卷。



《刘礼部集》和《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刘逢禄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为往圣继绝学”，更在于用深邃思想发出时代强音，推动时代变革和社会发展。他重新整理了公羊学的统绪，上承董仲舒、何休，下开龚自珍、魏源，使沉寂了近两千年的公羊学得以再次繁荣，为近代维新变法准备了儒家经学的理论武器。在清代公羊学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晚清的学术和政治局面都有较大的影响。《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是刘逢禄的代表作，也是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在书中，刘逢禄通过对何休解诂《公羊传》义例

的归纳，阐发了自己的公羊学思想，建立起了严密的公羊学理论体系，实现了公羊学在清代的全面复兴。

刘逢禄提出“变”之思想，可谓“千年一人”。盛极必衰，衰极必治，兴衰更替是历史运行的规律。然而在刘逢禄看来，人们在历史进程面前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可以积极地推动社会的变化，由衰转盛，这必须依靠“通三统”和“异内外”来实现。“通三统”的核心就在于一个“变”字，社会是变化的，人世的制度也要相应地及时变革。刘逢禄从“通三统”中慧眼独具地挖掘出“天下无久而不敝之道，穷则必变”之义，警示世人走出盛世的旧梦，面对衰败的现实，对那些弊端丛生的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

刘逢禄绝非埋头书本之经生，在研究公羊学中就体现了联系现实、为政治理想服务的一面。他的书中，讥切时病，倡言改制。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庆皇帝驾崩，刘逢禄据经义制定丧仪。道光四年（1824），越南使臣对敕书称其“外夷”不满，刘逢禄据经义说明“夷”非蔑称而解决争端。他多次引春秋公羊义来解决民间法律纠纷，其经学研究在政治活动中作用发挥明显，体现了公羊家“经世致用”的重要治学特点。

## 中国人类学奠基人吴定良



吴定良

吴定良（1893—1969），金坛人，人类学家、教育家，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人，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其人类学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

吴定良光绪十九年（1893）出生于一个开明的地主家庭。2岁时母亲去世，12岁时父亲病故，他被迫离家独自生活，虽然条件艰苦，但仍坚持求学，1916年考入了扬州市立第五师范学校。师范毕业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后改名为东南大学）教育心理学系学习。1926年，江苏省招收两名官费留学生，他前去应考，以优异的成绩被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学系录取，开始攻读统计学。次年，他转学到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继续攻读统计学。在伦敦大学学习期间，他发表了《相关率显著性查表》等多篇统计学方面的论文，对当时统计学的相关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为其他各领域的学者利用相关率来分析事物间的相关程度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他在学术上刻苦钻研的精神，深得导师和同事们



的赞扬。1928年吴定良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1930年由国际统计学会大会投票选举通过，他成为国际统计学社的第一个中国社员。

1929年，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化石，而研究工作却是由英国人主持的。当时在英国工作的吴定良感慨道：“自己国内的宝藏，为何要让外国人去研究，此实属中国人之耻辱。”这件事成为吴定良从统计学转向研究人类学的心愿和契机。从此他立下了钻研人类学的决心，申请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补助费，继续留在英国学习人类学，成为第一个学习人类学的华人留学生。之后，吴定良在英国著名的学术杂志上先后发表了50多篇论文，1934年又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由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马斯推荐，他加入了国际人类学社，并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人类学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吴定良与另一位中国科学家欧阳翥（zhù）一起，以翔实的论文有力地驳斥了“中国人大脑结构和功能不如欧洲人”的谬论。在留学英国期间，吴定良在骨骼测量学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其研究方法至今仍然被各国人类学家所采用。

1935年，应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邀请，吴定良回国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

学组主任兼专职研究员，同时还筹建了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任筹备处主任，并且创建和主编了《中国人类学》，对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吴定良对我国统计学和人类学人才的培养也做出了突出贡献。1936年，他与金坛学界的一批名流共同筹办起了金坛县私立金城中学，他被推选为董事长。在他不懈的努力下，1947年金坛县立初级中学又增设了高中班，为家乡培育了一批人才。抗战胜利后，吴定良到浙江大学担任史地系教授，开设了普通人类学及统计学课。他讲课内容丰富，平易近人，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对本专业的热爱。1947年9月，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吴定良担任系主任兼所长。他还曾兼任国立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批体质人类学的科研人员与师资力量。1948年，吴定良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并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院士会议。

1950年，吴定良与几位学者一同发起组织中国人类学学会。1957年他在复旦大学设立的人类学专业，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都一直是我国高校中惟一培养人类学人才的学科专业。

吴定良即使承担多项教学任务也没有停止科研工



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合影  
(第五排左起第一为吴定良)

作。其间他还与同事们一起，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了对少年儿童的体质调查、收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血型资料等科研活动，为我国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积累了丰富资料。50年代中后期，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吴定良接受了很多与人类学知识相关的国防和工业生产建设的任务。由此，他也成为中国应用体质人类学知识为工业服务的创始人，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人类工效学的奠基人。

1957年春，江西化纤厂在南昌下沙窝破土动工。一天，基建工人在挖地基时突然发现一堆骨殖，还有一副

脚镣。这一带正是当年革命烈士方志敏的就义处。同年12月28日，遗骨被送至上海，通过吴定良和其他专家的反复检验分析鉴定，结果证明这确凿无疑是方志敏的遗骨，英烈终于得以告慰。



1957年4月9日，吴定良教授赴南京博物院鉴定的北阴阳营出土人骨架

吴定良一生勤俭朴素，潜心科研，工作兢兢业业。由于积劳成疾，他晚年时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却仍然不肯休息，继续进行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62年吴定良患中风卧病在床，还在坚持整理科研资料。“文革”期间，他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遭批斗抄家。当他看着那些凝结着自己毕生心血的研究成果被收缴时，不禁在病床上痛心疾呼，后病情急剧恶化，含冤去世。1979年，复旦大学召开追悼会，为吴定良平反昭雪。

## 新中国第一代大法官张志让



张志让

张志让（1893—1978），著名法学家、律师、教授，新中国第一代大法官。

张志让出生于常州青果巷，与张太雷是堂兄弟，两人曾一起就读于家塾，兄弟情义深厚。张志让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家中聘请中、英文老师教习。宣统元年（1909），张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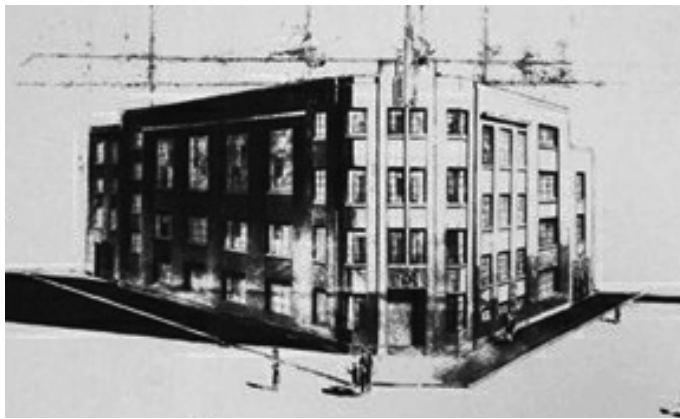
让就跟随叔父张采甄、老师陈巢南参加了柳亚子在苏州组织的南社活动。他国学扎实，才思敏捷，充满激情，是南社19位成员中最年少者，被柳亚子称为“好汉”。张志让的一生，都无愧于“好汉”称号。

宣统三年（1911）至1921年，张志让求学十年，立下宏志。他背起行囊先后求学于北京清华学校、上海大同学院和复旦公学。1915年，漂洋过海到美欧留学，受著名法学家王宠惠的影响，选读“美国大学各社会学科中最难读”的法律专业，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转而又去德国柏林大学法律系继续深造。

1921年学成归国，张志让受常州同乡、时任司法总长董康的邀请，北上进入司法部工作，同时在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校兼课，并撰写了大量的法学学术论文，如《希腊急进性质之农地法》《美国在华领事裁判制度》等，引起当时法学界高度关注。

稳定闲适的生活留不住张志让忧国忧民积极进取之心。张志让在北京的几年中，看尽了军阀争夺政权以及政府上下权利争夺、昏天黑地的现象，认为“要想在这种环境中做出任何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真所谓南辕北辙”。为寻求为民服务之道，张志让毅然辞官南下。1927年3月他来到武汉找到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者、堂弟张太雷。兄弟俩彻夜畅谈，共叙理想。张太雷推荐张志让进武汉革命政府最高法院工作，承办民事案件。张志让开始接触研读马列著作，政治观逐步渗透他的血液，思想随之进入新的境界。

1927年4月，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决裂。张志让拒绝去南京为国民党政府工作，决定做一名真正的律师，履行神圣的法律义务。12月，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张志让更坚定了为民主与自由而努力的决心。1928年3月，张志让加入上海律师公会，开设律师事务所，开始了职业律师生涯。1932年起，应聘任复



上海律师公会会所旧址

且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1935年至1938年兼法学院院长。1934年，张志让在《法轨》第1卷第2期发表《借英国法中许多希奇有趣之点来阐明法律的性质》一文。该文确立了对近现代中国法学的新型认知模式。他一生都在律师、法官、法学教授等多种角色中穿行。

张志让为穷苦人辩护，为劳动者争取权益，为解救共产党员被捕的案件全力以赴。张志让承办了许多著名的大案要案，人们也许不熟悉他的真名，但一提起张律师则有口皆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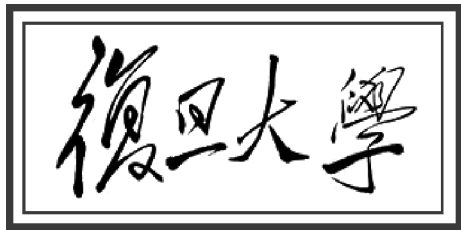
1935年张志让陪同宋庆龄去南京营救因抗议被捕的英籍人牛兰；1936年为被诬为枪杀日本兵的无辜同胞杨文道、叶海生辩护；1936年底“七君子事件”爆发后，张志让慨然应允，与20名律师一起为“七君子”自愿义

务出庭，并担任首席律师。反动当局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将“七君子”无罪释放，张志让也因精彩的辩护而再次名声大振。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志让更是马不停蹄地辗转于广西、重庆、上海等地积极参加各种宣传抗战活动，办杂志、写文章，积极主张宪政与民主。重庆谈判期间还应邀得到毛泽东主席的特别会晤，更加坚定了拥护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决心。

1946年受中共委托，张志让与马寅初、翦伯赞等近百名知名教授组织成立了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并担任副主席。1947年“五二〇血案”发生后，张志让挺身而出，以解除自己的法学院院长职务为条件与校长章益达成不开除其他教授的协议。这些活动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上海解放前夕，张志让受党组织委托，多方做复旦大学校长章益的工作，团结各方面力量，挫败了反动当局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的计划。1949年10月1日张志让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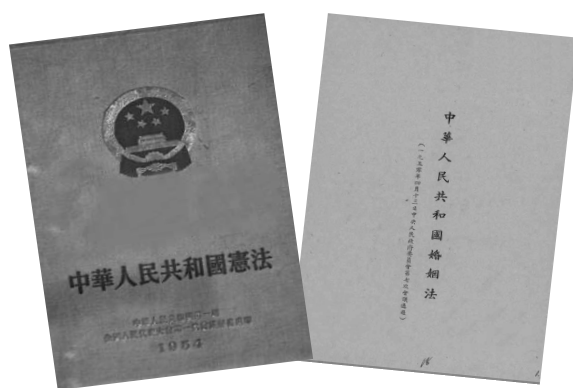
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受接见时还请毛泽东题写复旦大学校名。



毛主席亲笔题写复旦校名



不久张志让北上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最高人民法院任职期间，张志让参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第一部《婚姻法》，为新中国第一代大法官。1978年4月26日张志让在北京逝世。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现代教育家孟宪承



孟宪承

孟宪承（1894—1967），现代著名教育家。他在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其高等教育办学思想被教育界所公认，他还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国教育史教学和研究人才。

宣统三年（1911）孟宪承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外文系，1918年入华盛顿大学专攻教育学，师从杜威；1920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又赴伦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研究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教育哲学；1921年回国，受聘于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授；1923年，受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之邀前往任教。

“五卅惨案”后，爱国学生运动浪潮迭起，孟宪承不顾个人前途，与美籍校长据理力争，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而后，孟宪承等教授和一批学生为了抗议校方的无理规定，毅然宣布脱离圣约翰大学。离开圣约翰大学后，孟宪承联合一些教育界人士，发起创办了光华大学。此后曾一度担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秘书长、国立中

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1942年，孟宪承当选国民政府首批29位部聘教授之一，教育学科仅他一人；抗战胜利后重返浙江大学任教，兼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杭州解放，军管会委派



国立中央大学

孟宪承为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参与主持浙江大学校务；1951年孟宪承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后专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孟宪承对文、史、哲等学科具有很深的造诣，通晓英语、法语，晚年还刻苦学习俄语。他的学术研究著作，除占有翔实资料外，更具有科学的识见。

为了研究民众教育，他曾亲自创办和领导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进行各种教育实验研究。著有《民众教育》《民众需要的是什么教育》等论著，是我国民众教育的先驱之一。

在教育理论方面，孟宪承先后出版专著《教育概论》《教育通论》《教育史》《西洋古代教育》《大学教育》《民众教育》等；编写《教育哲学》《中国教育

史》《外国教育史》等教材。此外，他还翻译西方教育名著，如J·杜威的《我们怎样思维》，W·H·基尔帕特里克《教育方法原论》，B·H·博德的《教育哲学大意》《现代教育学学说》等专著。



《教育概论》和《教育通论》

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首任校长，孟宪承在办学指导思想上，认为大学是最高的学府，理想应该包括“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和“民族的社会的的发展”。他十分重视培养师资，认为提高教师的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是办好大学的根本。他大力主张大学应加强基础教学，要让学生掌握坚实的、广博的基础知识，不宜过早地分专业，同时还必须注意培养优良的校风和学风。

孟宪承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班。他对研究生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认为从事中国教育史的科学研究，必须经受严格的基本训练，如文献资料的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与方法的学习、外国语文的训练等。

孟宪承经历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两次灾难

后，于1967年病逝。

2006年5月15日，经教育部批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出关于做好“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宣传活动”的通知，列入第一批计划宣传的共18位大学校长，孟宪承与吴玉章、李达、成仿吾、彭康、贺禄汀、匡亚明、蒋南翔、陈垣、陈望道、马寅初、周培源、苏步青、王亚南等名列其中。

## 人类学、民族学家芮逸夫

芮逸夫（1898—1994），溧阳人。曾就读于东南大学外文系，1929年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1930年，因遇见同乡凌纯声，一下迷上了民族学，由凌纯声引荐，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任助理员，随凌纯声从事赫哲族语言记录及负责语言资料分析和整理，从此他开始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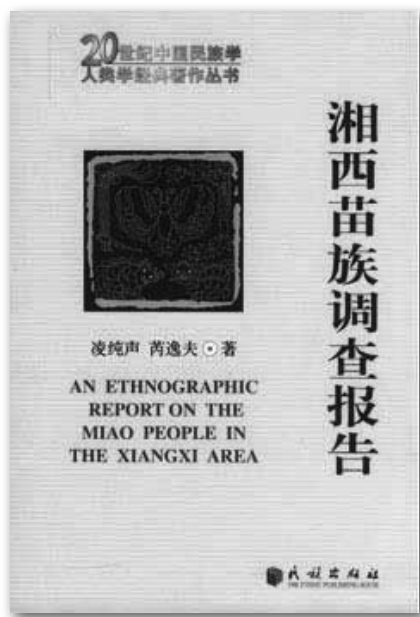


芮逸夫

1934年，芮逸夫转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46年任中央大学边政系教授；1949年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第四组主任，同时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授，为台湾发展人类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957—1958年，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人类学系和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从事研究工作；1959—1964年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主任并兼任民族与华侨研究所主任；1964年辞职，再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

系和印地安那大学人类学系任客座教授；1965年回到台湾，除继续兼任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民族与华侨研究所教授外，被“中央研究院”聘为终身研究员；1981年7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

芮逸夫自从1931年被凌纯声引入民族学领域后，前期主要是协助凌纯声从事研究工作，先是调查赫哲族，1933年又随凌纯声到湘西凤凰、乾城、永绥等地调查考察苗族、瑶族生活状况及社会情形。他具体负责语言、歌谣、民间故事的搜集和研究。这次调查结束后，他与凌纯声合著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一书。这是中国最早对苗族人的研究，其中由他撰写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传说》，对中国的神话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4年，他又协助凌纯声调查浙江南部丽水等畲（shē）民生活习俗，完成《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一书。之后，他开始独自研究。1935—1936年，芮逸夫应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国民政府外交部邀请，参加中英滇缅南段边界进行详细考察调查。这次调查，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少数民族的珍贵资料，为日后综合研究人类学和民族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间，他还陆续撰写发表了《记栗粟语音兼论所谓栗粟文》《僚为仡佬试证》《云南西北的山头人》《云南西北的傛黑人》《云南西南的摆夷人》《滇缅边境的侏仡人》等论著。

抗日战争期间，芮逸夫随中央研究院先后辗转昆明、四川等地，除延续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调查外，还对四川南部兴山、叙永雅雀苗及珙（gǒng）县等地进行调查，并开始对中华各民族进行综合研究，先后完成《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中华国族解》《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西南民族与缅甸民族》《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等论著。

抗战胜利后，芮逸夫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亲属制度研究上，运用现代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的亲属称谓，先后发表《伯叔姨舅姑考》《苗语释亲》《中国亲属制度的演变及其与家族制度之相关性》等多部论著。

芮逸夫到台湾后，围绕台湾原住民社会组织等议题



进行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瑞岩泰耶鲁族的亲子联名制与保俾么些之父子联名制比观》《瑞岩泰耶鲁族亲属制初探》《台湾土著各族划一命名拟议》《民族平等的地方自治与山胞社会》等论著。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他开始全力从事有关中国民族、文化与社会的综合研究。接着，他又用十年时间编纂完成了一部《二十三种正史及清史中各族史料汇编及引得》，全书共540万字，是中国迄今为止，民族研究学领域最为浩繁的一部资料汇编书籍，台湾著名学者李亦园评论此书“融合人类学与史学于一炉，为中国学术界开创了新的学术途径”。

芮逸夫一生研究广泛，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研究重点，但他始终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中国的民族、社会与文化”。针对这一主题，他又分别从“整体综合”与“个别族群深度”两个角度作为切入点，研究各民族的起源、播迁、繁衍、兴衰。前者是从人类学、民族学和人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族群的形成与涵义，以及中国民族所包含的分支派别作系统的分析与阐述。后者是根据多年的田野调查和积累，对个别族群进行民族志的整理与民族史考订。他是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发展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代著名人类

学家。一生著作等身，代表作有《川南雅雀苗的婚丧礼俗》《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等，并主编《人类学辞典》《苗蛮图集》等书。台湾大学专门设“芮逸夫教授奖学金”予以纪念。



## 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史良

史良（1900—1985），著名法学家，任新中国首位司法部长、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妇联副主席。

史良的一生，慷慨激烈、波澜壮阔。她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人董康的得意门生。1931年，史良初任律师，经恩师提携，很快就跻身上海名律师行列，一年后自己在法租界开办了律师事务所。史良的座右铭是“保障人权”，立志要为受冤屈的人们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她帮人打官司从不计较报酬，一些穷苦人找她申诉冤情，她还常常主动予以接济。史良这种高尚的职业风范，在上海律师界备受赞誉。1947年，史良在上海承办周纯卿遗产案。周纯卿是上海有名的地皮大王，史良用了一年零四个月时间，详细调查清楚了他的财产情况。根据当时上海律师公会章程，史良应得的公费酬金颇大。因继承人无现款，便将上海南京西路的南



史良

海花园饭店一幢楼房60余间和七浦路里弄房屋10余幢作为酬劳抵给史良。解放后，史良将南海花园饭店的三层楼房拨给民盟上海市委员会作办公用，其余房屋全部献给了国家。

史良不仅用法律武器维护劳苦大众正当权利，而且还凭借她出众的辩才营救了一批爱国人士。在史良的律师生涯中，她先后援救过邓中夏、任白戈、方知达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邓颖超曾特意找到史良，感谢她出于正义为营救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所作的努力，感谢她勇敢走上法庭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所作的辩护。

敢作敢为的史良，既是人民的好律师，也是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人。1935年，史良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第一个救国组织——妇女救国会。1936年，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她同沈钧儒等到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顽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于11月22日悍然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史良是七君子中惟一的“女君子”。不久，史良从法院巧妙地逃走。史良逃走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画影涂形，悬赏5万元通缉她，但她仍然乐观。为了嘲弄国民党反动派，她甚至在上海爱文义路口一张悬赏通缉她的招贴下



史良（左二）、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等救国会主要领导人率领上海各界群众参加示威游行

拍了一张照片。一个月后，她将救国会组织工作料理完后，自动到苏州高等法院投案，坚持要在法庭上与战友们并肩作战。自1936年12月初到1937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对“七君子”先后进行了五次审讯，史良、沈钧儒等均以同一个声音进行答辩。史良更是把敌人的法庭当讲坛，用法律作武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批驳国民党反动派罗织的罪状，毛泽东赞她为“女中豪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史良担任第一任司法部部长。接任伊始，她就投身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建立健全司法制度的工作。1950年5月1日，在她的努力下，旨在反对包办强迫婚姻、提倡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的新《婚姻法》出炉。从此中国妇女在爱情与婚

姻方面拥有了和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新《婚姻法》是史良担任司法部长后第一个参与主持制定的一部法律，也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大法。这是史良长期从事律师业务，领导妇女运动，同情关心妇女，为被压迫妇女争自由、平等权利思想的反映与实现。毛泽东为此特别批注：《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婚姻法》是家庭的根本大法。在《婚姻法》的具体落实过程中，因史良的提议，一些地方法院设立了婚姻庭，专门承办处理妇女婚姻案件，并由妇女担任庭长。

作为司法部长，史良十分重视司法的民主原则，她从“司法独立”的观点出发，主张司法与行政应该截然分开。史良对律师制度与公证制度也有着鲜明的主张，1950年，在第一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期间，她就提出了



史良(中)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与宋庆龄(左一)、蔡畅交谈

建立与推行新的人民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为了建立人民的法制与法律程序，还提出建立并健全值日制、问事制、法医检验等制度和机构，使司法工作有序运转。

在司法部工作的8年时间里，史良领导司法行政机关认真履行职责，革故鼎新，大胆开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提出过许多纲领性的建议、主张和要求，成为以后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她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被誉为“新中国人民司法工作的杰出开拓者”。

1985年9月6日，史良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85岁。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杨尚昆等参加追悼会并敬送花圈。

史良的一生可谓传奇曲折。通过法律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人民服务，是史良的毕生志愿。在旧时代，她是大上海著名律师，民族救亡运动、争取民主运动的积极投身者，为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新时代，她成为新中国人民司法工作的开拓者、司法行政工作的奠基人，为新中国的人民司法工作从理论到实践作出了杰出贡献。

## 中国民族学研究鼻祖凌纯声



凌纯声

凌纯声（1901—1978），192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26年被公派到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师从人类学家欧姆·莫斯等研究人类学和民族学，1929年获博士学位回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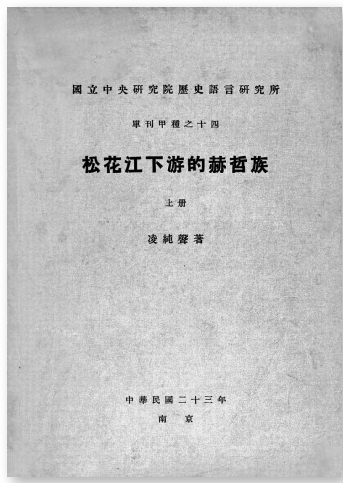
当时中国还未独立开展民族学研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发现凌纯声这位国内独有的人才，立即在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立民族学组，聘凌纯声任主任和研究员；1944年凌纯声任国立中央大学边政学系主任和教授；1945年7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抗战胜利后，改任边疆教育司司长和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馆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1959年当选“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第三届院士。

1929年凌纯声从法国获人类学和民族学博士学位回国时，民族学研究在中国还是空白。回国后，他第一个提出民族学科定义，并说“民族学可分记录和比较的两种，偏于记录的称为民族志，偏于比较的为民族学”，



认为民族学是“研究文化的起源、发达、散布及传演的科学”。

凌纯声进行长期深入的调研和实地考察，认为中国要发展民族学，首先得从记述民族学开始。赫哲族是个跨国民族，俄罗斯境内的称“那乃人”。我国的赫哲族，主要居住在黑龙江省“三江”（同江、松花江、黑龙江汇合地）平原和完达山一带，是我国北方惟一以捕鱼为主要生产方式和使用狗拉雪橇的民族。历史上该民族曾因穿鱼皮和使犬，被称为“鱼皮部”和“使犬部”。凌纯声首先选择中国较有特色的东北赫哲族作为研究起步，展开田野调查，按当时国际学术界规范，结合国内实际情况，拟订调查提纲，设计民族风俗调查、生活习惯、文化等表格展开研究。这一调查，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开展民族学研究的第一个人科学民族田野调查，“开创了我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先河”。经过多年艰辛的努力，最后他完成了研究著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于1934年由中央研究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此书被誉为中国第一本“科学民族志”，凌纯声也被称为中国“科学民族志”的开创者。为了进一步推动民族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凌纯声又参考法国民族学派精细调查方法，结合自身野外实践经验，在《民族学研究集刊》上发表了《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一文，它与《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学者开展西南、西北边疆民族调查的范本。这些论著和研究方法，不仅引领中国早期开展人类学的研究走向，同时也引领中国民族学研究发展的方向。

1933年，凌纯声结束赫哲族调查后，进一步开展对苗族、瑶族等进行实地调查，并最早运用影视手段搜集研究民族学。调查结束后，他又整理出版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书》。1934年，凌纯声与蔡元培、杨堃、吴文藻、孙本文等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会。随后，他继续到浙江丽水调查畲族，到滇西对佤、拉祜、景颇等少数民族调查，完成了《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一书。同时，他最早运用国外施莱赫尔创立的语言谱系分类法，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划分为百越、氏（dī）羌、苗瑶三大族系，从而奠定了中国民族分类的基础。

抗战爆发后，凌纯声转而到西南边陲后方，开始从



《畬民图腾文化的研究》一书提及的人物、地方以及若干年后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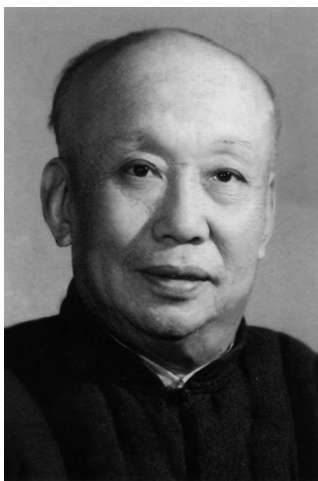
事边疆民族学研究。他把重点放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族群关系研究上，先后著有《中国边政之盟旗制度》《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中国边疆文化》等。他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国族（汉族）与边疆各族血统的混合，不断创造新生命而成的。他考察论证昔日被视为是无稽之谈的夷汉同源说，认为夷汉其实是同宗异族的兄弟，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人口、文化、空间上成为举世无双的民族，主要是汉族的独自发展和边疆各族的融合加入，才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大观。

到台湾后，凌纯声重点研究环太平洋文化。他在自己著作《中国大陆学说》中，曾以东南亚古文化特质，如纹身、缺齿、拔毛、竹簧口琴、腰机纺织、父子连名制、猎首、灵魂崇拜、室内葬、崖葬等等，推定台湾土

著民族是中国古代长江以南的越獠（在今浙江）民族，于纪元前，迁徙到了台湾孤岛，后来与外界隔绝，故能保存其原有的语言文化而不受外来的影响。他从民族历史的渊源，论证了台湾在史缘上、地缘上和血缘上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得出了台湾土族为百越之族的结论。后期他把主要精力用在著书立说和筹建民族学标本上。他在长期的实地调查中，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实物资料，创建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标本室，收藏标本将近8000件。1978年7月凌纯声去世后，研究所为纪念他对民族学作出的特殊贡献，将标本室命名为“凌纯声先生博物馆”。

凌纯声一生还先后出版了《中泰文化论集》《台湾与东亚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笈弋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中国与大洋洲的龟祭文化》《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等21本专著，并发表很多重要论文。

## 明清史研究大家谢国桢



谢国桢

谢国桢（1901—1982），我国著名明清史专家及版本、目录学专家。谢国桢的一部部明清史专著，成为众多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书，被誉为明清史研究的“钥匙”。

谢国桢小时未进正式学校接受教育，由善书能文的祖母抚养长大。祖父谢愼（xuān），嗜书成癖，插架甚丰。他从小耳濡目染，对文史产生兴趣。

1919年春，18岁的谢国桢离开家乡求学北京，就读于北京汇文学校大学预科。后随吴北江（桐城派大家吴汝纶之子）学习古文诗词，并兼做家庭教师，半教半读。1925年，以头名考取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在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教诲、指导下从事史学研究，对明清史和目录学用力尤多。清华园的学习，对其一生教学与科研影响极大。其间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明季奴变考》一文。

1926年，谢国桢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结业，名列第一。之后随梁启超到天津，在其家教授梁氏子女读书。在梁启超指导下，他研究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和搜集明清之际的资料，饱览了梁家藏书。经梁启超介绍，谢国桢又遍览了朱希祖、伦明、傅增湘等名家藏书，并成为梁启超的得力助手。梁启超逝世后，他到北京图书馆担任编纂兼金石部收掌之事长达十余年。在北京图书馆，他大量阅读馆藏及故宫博物院、东方文化会等处藏书，



《晚明史籍考》

还南下江浙，北上大连、沈阳，甚至东渡日本访求书籍。

1931年，他完成了80万字的《晚明史籍考》20卷。柳亚子称诮：“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晚明史籍考》被誉为“研究明清史的一部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1932年，谢国桢经胡适、傅斯年介绍，到南京担任中央大学专任教师，教课之余，著成了《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问世。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谢国桢来到长沙，供职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1938年春，应中华文化基金会之邀，他回北平典守北平图书馆的金石图书，曾为中日庚款基金委员会所办的东方图书馆编写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后受周作人延聘到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谢国桢在北平临时大学任教。1947年为开明书店编著《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1948年秋，由钱穆介绍到昆明云南大学和王华书馆讲学。1949年，遵范文澜之意到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10月被推荐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谢国桢更加勤奋教书、著述。1957年底，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一直到去世为止。1957年，他的旧著《顾亭林学谱》再版，并推出新著《南明史略》和《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1960年又出版了专门介绍明清笔记史料的《明清笔记谈丛》。

“文化大革命”期间，谢国桢受到残酷迫害，在艰难的条件下编成了《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初



《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

稿，他又从汉代石刻画像中受到启发，完成了《两汉社会生活概述》初稿。

晚年，谢国桢在回忆自己的学术人生时说：“我从25岁一直到年垂八十，风里来，雨里去，不怕跌跟斗，头上跌了包，抚摩着伤痕，爬起来再往前走。”他以顽强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给学界留下了一部部力作，推动了明清史的研究，也影响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史学人才。



谢国桢信札手稿



## 社会教育家、民主斗士李公朴

李公朴（1902—1946），是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社会教育家、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



李公朴

李公朴早年关心时政，关注国家命运，逐渐形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之不存、何以为家”的爱国救国抱负。为了提高民族素质，他多年从事社会教育事业和文化出版事业。他的教育思想基本点是面向群众，面向实际，关心社会最底层的学徒、店员、职工、学生等。正如希腊神话中的“先知”普罗米修斯把“凡是能够使人类幸福的都教给人类”一样，在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时代，李公朴把革命真理和文化科学知识传播给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

1932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和《申报》业余补习学校，为四五千在职青年和失学、失业青年提供专业进修机会。这些青年成为当时上海

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力军。1933年，为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思想专制，由李公朴和蔡元培、陶行知等发起了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活动。1936年，李公朴创办读书生活出版社并担任社长，第一次在中国出版了《资本论》，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他高举“国防教育”、“国难教育”的大旗，多次深入抗日前线和敌占区进行全民抗战宣传，积极创建民族革命大学，为抗日战争培养人才。1938年冬，李公朴抵达延安，毛泽东多次接见了。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李公朴组织了“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晋察冀边区开展抗战教育工作，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成《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客观公正地宣传共产党、八路军。1942年，他创办北门书屋，1944年扩大为北门出版社，出版了许多进步书籍。他还系统编译了“北门小丛书”，出版了《孩子们》月刊和中学生辅导读物等，为西南进



北门书屋旧址

步文化出版事业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民主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李公朴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他用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向世人展现了民主人士奔走国是的社会良知，彰显了常州人敢于担当的人文品格。他最爱写的格言是：“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他积极投身于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国民党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战场。

1936年11月23日凌晨，李公朴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先后被捕的还有沈钧儒、邹韬奋、史



1937年7月，“七君子”出狱时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等救国会领导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李公朴在狱中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他曾正气凛然挥毫题词：“拼七人的自由，争取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自由。”法庭上，他仗义执言，据理力驳，把审判者送到了被审判者席上，令法官狼狈，听众折服。

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成立，李公朴被选为支部执行委员。这一年的“双十节”，李公朴在昆明扩大纪念会上发表宣言，提出了“实行民主，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西南”的响亮口号。1945年，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公朴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与民盟中央的决策。他和民盟老一代领导人一起，团结带领广大民盟所有的知识分子，全力投入反帝、反独裁、反内战的民主革命斗争。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议胜利闭幕大会，李公朴是主席团成员之一，担任总指挥。在会上，他义愤填膺，深刻揭露蒋介石背叛人民、挑起内战的罪行。国民党特务破坏大会，将李公朴头部打伤，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李公朴对前来探望的周恩来说：“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统一，我受点伤算

不了什么，我要更加坚强起来，力争人权、自由和民主！”

同年5月，回到白色恐怖笼罩的昆明后，李公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但他争取和平民主的决心毫不动摇。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遭到暗杀，就这样为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事业而牺牲！他用生命的代价诠释了理想与信念：一切为了民主。李公朴牺牲后，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唁电：“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

李公朴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坚持革命、顽强斗争的一生，是忠诚于中华民族进步事业与和平民主事业的一生，是献身中国文化事业和社会教育的一生。

## 抗战宣言《告全国军民书》的执笔者程沧波

程沧波（1903—1990），著名的爱国报人。卢沟桥事变后，因执笔全面抗战宣言《告全国军民书》而名载青史。



程沧波

程沧波幼年读家塾，1912年进冠英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考取常州中学堂，遵父命改师江南大儒钱名山，成为寄园才子；1917年与钱氏次女云

蕖订婚后，即赴沪就读于南洋中学，后考入圣约翰大学读了三年；1920年转入复旦大学攻读政治专业，1925年毕业。踏入社会后，任上海《时事报》主笔；1927年初夏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与历史专业学习；1931年从伦敦回国，任国民会议秘书；1932年5月《中央日报》改行社长制，程沧波任《中央日报》《中央时事周报》社社长，重庆《世界日报》总主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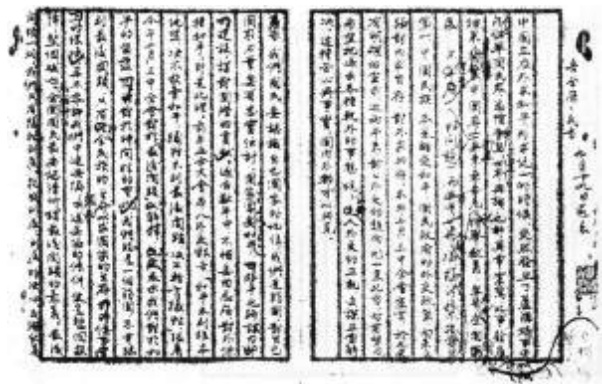
1937年全国抗日，群情汹涌，有一触即发之势。6月下旬至7月中旬，蒋介石分批邀请各界领袖人物到庐山，或聚餐或茶话会，边吃边谈，每批七八人，不超过

十人，并指定若干要员作陪，陪吃而不发表政见，程沧波即为陪客之一。一天中午，程沧波奉命参加了大学校长、著名教授的谈话活动，饭后蒋介石示意他留下，就座后蒋说：“布雷先生病了，你替我写一篇稿子。”当时情景，程沧波于1976年台湾《传记文学》上撰文《蒋总统与我》，作了详细叙述——

委员长指示是“针对当前时局的一篇稿子，预备在训练团发表”，并扼要说明内容与要旨，约略谈了十几分钟后，我请示稿子什么时候呈阅，委员长指示，今日下午七时。我一看表，当时已过下午二时半，即致敬而退。到仙岩饭店（牯岭49号），立刻到房中凝思。当时胡适之先生住在我隔壁，他不知如何知道我将起草一篇重要文稿，他跑进我房间说：“委员长平时的文告总嫌过长，你此次能否用三百字完成此文？”我答：“能六七百字或不超过出一千字完成此文，已是吃力，三百字完成此文，我无此本事。”他笑着出去说：“不打扰你了！”我正在凝思奋笔之时，钱大钧（当时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敲门进入我室说：“你能不能将文稿于5时完毕，因为夫人（按：宋美龄）要看文稿。”当时已逾下午四时，我说你快走，到五时再来取稿。五时一过，钱先生准时而来，我把稿子交给他。当晚八时如

约到官邸去。他（蒋介石）说：“文稿已看过，很好，还有几处要商量斟酌。”后来连续几天晚上我都到官邸去，对文告继续修改。四五天后方在庐山训练团发表，那等于是全面抗战开始的宣言。

这就是蒋介石在庐山训练团演讲的《对卢沟桥事变后之严正表示》，全文约2000字。实际上这就是国民政府抗战的宣言。文中写道：“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为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苛妄；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全文字字铿



《告全国军民书》



锵，发人深省。不久，此文稿改为《告全国军民书》，向全世界广播。有人评论这篇文章，文笔雄浑流畅，和历史上许多政论名篇一样。在困难当头之际，它是一篇鼓舞士气的战斗檄文，是催人奋起的号角。周恩来也曾对《中央日报》记者说：“你们的社长写的文稿很好！”

1938年，程沧波到重庆续任中央日报社社长。1939年冬调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重庆三年多时间，还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主讲《新闻评论与新闻采访》。在复旦大学，他倡导新闻敢言学风，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民主治校，反抗强权，服从真理。

1940年9月，程沧波实在忍受不了国民党上层过多干涉，辞去中央日报社社长职务；1941年9月，程沧波被国民党中央派往香港，任《星岛日报》总主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渝，与成舍我等人合作组织中国新闻公司，投资经营重庆《世界日报》，主持该报的社评委员会，任总主笔。抗战胜利后回沪，接管上海《新闻报》并任社长。同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1948年当



《星岛日报》

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去香港，任香港《星岛日报》总主笔。

1951年程沧波由香港去台湾，历任台湾中央大学、东吴大学、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教授，台湾书法协会理事长，潜心著书立说研习书法，发起成立中国书学会并任会长。书学会以“研习我国书法艺术，传扬中华文化”为宗旨。其专著有《时论集》《沧波文选》《土耳其革命史》《民族革命史》《历史、文化及文物》等。



20世纪50年代，程沧波与胡适（前排中）、束云章（右一）汪竹一（左一）合影

## 中国古典文史学家缪钺



缪钺

缪钺（1904—1995），  
溧阳人，著名历史学家、文  
学家、教育家、词学家、诗  
人、书法家。他曾担任国家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  
问、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会长、元好问研究学会名誉  
会长、四川杜甫研究学会名  
誉会长等。

书香门第出生的缪钺，儿时即从外祖父诵读《论语》《孟子》，入小学、中学后，学习目录、文字、音韵、训诂、文学等科的知识，课余时间广泛阅读古书，包括经、史、子、集各方面，养成了读古书的兴趣与能力。他不仅天资颖悟，而且勤奋刻苦。在小学、中学时，他养成背书习惯，深得古人读书之法，“熟读深思”是他的座右铭。据说，凡是听过他讲学的人，无不钦佩他惊人的记忆力。他在讲课中可以不看讲稿，能背出整段的史料。1979年，他患白内障失去视力，给研究生讲授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史，完全凭记忆，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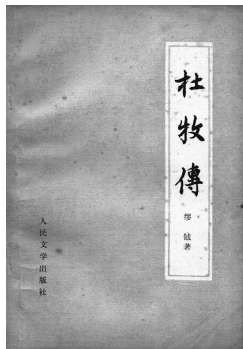
述了约30多个作家，逐个评论他们的长短得失，引用大量的诗赋材料，由研究生记录整理成稿，然后同原书核对，基本正确，学生无不惊叹先生积学之深厚。他说：

“我从小养成背书习惯，非但不以为苦，还觉得是一种乐趣”，“记忆力越练越强。”他在指导学生时，经常谈道：“熟读成诵的书，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其感悟和教诲对学生影响极大。

18岁那年，缪钺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然而父亲的去世使家中的经济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只能辍学教书。抗战以前，他在保定私立培德中学、私立志存中学和河北省立第六中学任教。其间，又任河南大学教授、广州学海书院教授兼编纂。抗战爆发，短期执教于河南省立信阳师范学校和四川省立江安中学，以后任浙江大学副教授、教授。抗战胜利以后，任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教授，1949年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缪钺被誉为是近现代兼治文史的大家。文史双栖，古今贯通。从文看，他在古典文学、古代文献、中国古代史等领域都有很大的成就。从《诗经》开始，顺流而下，楚辞、汉赋、六朝五言诗、《文选》与《玉台新咏》、唐诗、宋诗，以及至清末的词，他都有既系统又深入的研究。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词学是他致力研

究的重点。他一直是诗词并重、古今贯通的。从史看，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涉及思想、文化、经济、民族、人物诸方面，从先秦诸子到魏晋南北朝史再到近代的王国维，而他对魏晋南北朝史最为娴熟。



《杜牧传》

缪钺先天的禀赋与诗词艺术境界的契合，加上长期从事诗词艺术研究，遍读历代大家的作品，博采诸家之长。他的诗词创作，深得唐诗宋词之神韵，格律上得心应手，在意境上直追古人，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其诗词作品数量虽不多，但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缪钺一生著作等身，论文有百余篇。2004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缪钺全集》，共八卷。他的论著文字典雅，文笔庄重，兼取文言、白话之长，加上他的大家见识，深入而浅出，既给人以学术的启示，又给人以文学的享受，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缪钺全集》

缪钺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70年，教书育人，对后来才俊的扶持

提携不遗余力。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培养研究生。80年代之后，主要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为四川大学培养出首位博士。他讲授的课程有：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学术思想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史学名著选读、中国文学史、诗选、词选、六朝文、杜诗等多种。他对门下弟子明确提出三项要求：为人耿介、治学严谨、做事勤敏。他教育学生正直、坦诚，不曲学阿世、媚俗取宠。1989年，缪钺荣获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

1995年1月6日，缪钺因病逝于成都。他去世以后，史学大家周一良特撰一联：“文史回翔，绛帐春风三千弟子；诗词并美，灵谿妙谛一代宗师。”这是对他一生最为精准的评价。

## 新闻战线的号手恽逸群

恽逸群（1905—1978），常州地区中共组织最早的领导人之一，中共早期新闻系统一线领导者。著名新闻学家、社会活动家、历史学者。

1921年，年轻的恽逸群怀抱科学救国的梦想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修科求学。但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一年之后无奈辍学到无锡电话公司当练习生。1925年夏，受五卅运动影响，恽逸群投身政治活动。翌年8月，加入共产党。四一二事变后，恽逸群将乡下70余亩田地抵押，举债创办逸仙中学，以此为掩护培植革命力量，成为中共武进县委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1928年2月，恽逸群被捕入狱。出狱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宜兴县委书记、浙江省萧山县委书记和浙北特委秘书长。

1932年8月，与党一度失去联系的恽逸群进入当时上海最大的民办新闻机构——新声通讯社任记者，成为一名职业报人。从1932年到1951年，恽逸群从事新闻工



恽逸群

作近20年。

民主革命时期，恽逸群先后担任上海《立报》、香港《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和上海《导报》《译报》编辑、主笔、总编辑，并与范长江、夏衍、杨潮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全国记协的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积极为民主政治与民族解放奔走呼告。



《立报》

1935年底，他与70位记者联名发出《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抗议当局的新闻检查制度，呼吁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争取言论自由。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连续发表了《中国决不会作西班牙》系列评论，准确预见了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1938年，他又在《导报》发表《异哉汪精卫之言》一文，率先揭露汪的汉奸嘴脸。因为预见准确、文风犀利，恽逸群的社论“成为北至长城，南至两广、云南，西至甘肃、四川广大革命人民的主要参考材料”，受到国内外舆论界的重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恽逸群受党指派，打入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担任上海编译社社长，从事情报工作。1944年10月，因共产党嫌疑被日本宪兵司令部



逮捕，直到1945年6月30日才获释。10年后，这段经历成为其卷入“潘扬事件”的重要缘由。

1945年抗战胜利。这时的恽逸群已是一位年届不惑、在新闻界拥有较高声望的资深报人。解放战争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恽逸群一直从事党报的领导工作。同年11月，恽逸群调任华中新华社、《新华日报》华中版编委，并接替范长江任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翌年3月任《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4月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1947年2月，《新华日报》华中版与山东《大众日报》合并，任《大众日报》社与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第一副社长；1948年6月，任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8月创办《新民主报》并任社长兼总编辑；1949年5月，和范长江等一起创建上海《解放日报》任副社长兼总编辑，4个月后退任社长，直至1951年底离开领导岗位。

在这5年多时间里，恽逸群把和大众利害关系的密切程度作为衡量新闻价值的第一标准，顶着巨大压力，对党报存在的种种问题，大胆改革。他主张党报要多开辟专刊、专栏，丰富内容，满足群众需要。在他的主持下，《新华日报》华中版进行了改版，提高了经济、文化新闻的比重，开辟《批评与建议》专刊。他冲破了

“左”的思想束缚，提出广告能够促进生产，激励竞争，“刊登广告是报纸联系群众的工作之一”，为广告松绑正名，对当时新闻出版机构的企业化经营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1951年后，恽逸群迭遭政治打击。“三反运动”中，他因被诬陷挪用公款而被撤职、开除党籍。1955年，因“潘汉年扬帆事件”牵连，恽逸群再次被捕入狱。经过十年的牢狱生涯，他被下放到苏北阜宁县中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到严重打击。

在漫长的被囚禁和批判的岁月里，恽逸群以病弱之躯，痛陈时弊。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怪论层出，忧心如捣，强自抑制，自念既被剥夺发言权，也就没有发言的责任，以中国之大，何待于‘罪人’之喋喋不休。缄默数年，终不能忍。”面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乱象，他不顾当时严苛的政治气候，几次上书陈伯达、周恩来、张春桥等，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先后写作了《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也谈儒家和法家——兼及封建社会的开始》《论新八股》等一批极具政治洞察力的文字，率先对“个人崇拜”的党内和社会风气提出质疑并加以批判，揭露林彪、“四人帮”的造



1975年恽逸群与夫人合影

神阴谋，痛斥喧嚣一时的“评法批儒”运动，显示了一代新闻人的铮铮风骨。

因长期饱受折磨，恽逸群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患了严重的哮喘病、气管炎和肺气肿。1978年12月10日，在由中组部安排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之后不久，恽逸群旧病复发，猝然离世，享年73岁。

## 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狄超白

狄超白（1910—1977），出生于溧阳县普通的店员家庭，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经济学家。

1931年在南京中央大学政治系读书时，发生九一八事变。狄超白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的政策义愤填膺，毅然参加上街示威游行，坚定跟共产党走，主动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初，他根据中共南京市委指示，回溧阳成立中共溧阳县特别委员会任书记，以创办《溧阳日报》并兼任主编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同年3月中共南京党组织被国民党破坏，他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至南京警备司令部，判处十年徒刑，关入国民党中央陆军监狱。1934年7月经中共党组织通过蔡元培、于右任等营救，保释出狱。1935年在南京与进步人士成立读书会，后又参与领导南京救国会等活动，从事抗日宣传。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狄超白任《抗战周刊》主编。南京沦陷后，



狄超白

他转移到安徽六安从事抗战工作，任安徽省抗战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部长。1939年春创办《文化月报》。1940年1月转移到重庆，在周恩来等直接领导下，从事文化宣传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参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建。皖南事变后，被派往广西任中共桂林文委书记，团结文化界进步人士为党工作。1946年被派到香港，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学术小组组长，兼香港达德学院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主编《中国经济年鉴（1947—1948）》。1948年底达德学院被港英当局查封，他根据党的指示，率领达德学院部分师生抵达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计处处长，兼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1952年任国家统计局综合处处长。1954年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狄超白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之一。在被关押南京中央陆军监狱期间，狱中狄超白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他利用监狱让他负责抄写囚粮册的有利条件，偷偷开始撰写《通俗政治经济学》一书。待组织上把他营救出来，10余万字的初稿已形成，经修改于1935年4月交上海新知书店出版了《通俗政治经济学讲话》。此书理论联系实际，受

到读者广泛欢迎。在四年中，该书先后再版8次，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国最畅销的经济书籍读物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经修改又增版2次。他把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引上了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经济学家去了海外，经济学人才奇缺。在主持经济研究所工作五年中，他着力培养人才，招考中国第一批副博士经济学研究生；创办新中国第一份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综合经济权威刊物——《经济研究》月刊，联合中宣部、人民日报社有关部门主持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价值



《经济研究》月刊

规律在过渡时期经济中的作用学术讨论，为中央决策献策献计。同时，他主持制定了《经济科学研究十二年（1956—1967）远景规划》，为中央制订经济政策和制定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5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设哲学和社会科学部，狄超白与胡乔木、郭沫若、薛暮桥等一起当选为第一批哲学和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受极“左”路线影响，蒙受不白之冤，被开除党籍。1977年恢复工作，任《政治经济学辞典》编辑部负责人。同年11月7日因心肌梗塞逝世。1978年8月，组织上撤销对他的处分，为他彻底平反。

狄超白还是一位社会学家，对中国农村社会问题很有研究，是“中国农村派”的重要一员。狄超白认为，要解决中国土地问题，既不能走欧美各国所走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能立即像苏联那样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走“耕者有其田”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革道路。他主张政府要鼓励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对合作农场、集体农场予以积极支持，给予优惠贷款，优先借给各种工具和原料，优先向合作农场订购农产品，限制个体生产扩张，形成对富农、地主竞争优势，使合作经营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导形式。他的这一思想，对新中国农业改造和农村合作化具有重要影响，在1949—1956年新民主主义社会改造中被充分借鉴应用。

狄超白的经济论著有《中国土地问题》《经济学讲



《狄超白集》

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论城乡关系》《新中国的合作社》等，具有较高的历史和现实价值。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把他受冤未能发表的论著汇编《狄超白集》出版。2010年1月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把他列为其中之一。



## 《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

余纪忠（1910—2002）。

《中国时报》创办人、台湾新闻界泰斗、台湾当局“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

余纪忠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后来改名为南京大学）历史系，1934年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1937年七七事变后毅然回国，投笔从戎，报效国家。



余纪忠

1949年余纪忠举家迁居台湾，由于对台湾当局的不满，于1950年以“开明、理性、求进步；自由、民主、爱国家”为办报宗旨，在台北创办了《征信新闻》（后改名《中国时报》），并倾心投入新闻事业。

余纪忠认为，办报的最高原则就是要在任何关键时刻，发挥无私无惧的报人本色，为时代做见证，为历史留记录。这是他办报始终坚持不渝的原则。他还说，我们要比人家快一步半，因而办报伊始，《中国时报》的言论风格便具有鲜明的自由色彩，发表的评论、建议等深受岛内朝野重视，台湾岛内的许多学者、政坛人士和



《中国时报》

企业家都把《中国时报》的社论作为岛内政治的风向标。

1958年，台湾修改出版法，加强行政官署审查出版物，余纪忠认为此举不仅违反“宪法”精神，更扼杀了新闻自由。于是在《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若报纸成为一定形式，报人都成为缄口金人，国无诤臣，官无诤友，民无诤言，那我们将不得不为国事前途致其慨叹了。”在当时那种戒严状态、威权政治的气氛下，敢于挺身力争新闻自由，是需要有道德勇气的，而余纪忠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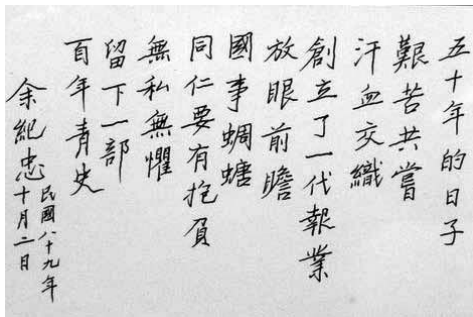
余纪忠的办报经历，伴随着台湾岛内政治的发展以及海峡两岸关系的变化而历尽坎坷。

1984年，美洲《中国时报》因报道大陆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上的出色战绩，被台湾官方以外汇管制的方式封杀。《中国时报》多次在台湾政治转型的关键期扮演重要的角色。1986年的陶百川事件，当时因为戒严，社会风气沉闷，很多媒体都以淡化的手法报道这件事，但《中国时报》却有大篇幅的报道。

1991年8月，新华社记者范丽青、中新社记者郭伟峰作为两岸隔绝42年后的第一批大陆记者踏上宝岛采访

“闽狮渔”号渔事纠纷事件。大陆记者上岛采访渔事纠纷事件，当时就是《中国时报》邀请的，从而开启了两岸关系的新篇章。

余纪忠反对台独，主张中华民族和平统一。2000年9月《中国时报》创办五十周年前夕，他亲撰长文，呼吁台湾当局痛下决心，与主张“两国论”者划清界线，强调中华民族不能分离。



余纪忠手迹

余纪忠对两岸的和平统一一直高度关注。在他的心中，“故乡情”与“养育恩”始终没有变，回馈故里、造福桑梓是他毕生的愿望与追求。他始终关心两岸关系发展，在他生命垂危时仍惦记祖国统一大业，昏迷前仍念念有词“心系两岸和平”。

20世纪90年代初，余纪忠叫儿子回故乡寻根祭奠祖先，并说：“余氏子孙不论身在何处，总希望叶落归根，心系祖国。”

1994年8月28日，由余纪忠出资100万美元设立的常州市华英文教基金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华英奖”授奖仪

式，在常州亚细亚影城隆重举行。

1995年4月24日，余纪忠回到阔别70多年的家乡，他亲笔为华英文教基金会题词：“属望吾乡子弟德智兼修，奋发精进，期成未来建国人才。”



1995年4月24日，余纪忠和夫人回到阔别70余年后的家乡祭祖

常州市华英文教基金会自设立至今，累计奖励优秀师生近4000人次，总金额达600多万元；对退休中小学教师进行新春慰问，累计慰问1000多人次，慰问金达70多万元。

余纪忠这位跨越世纪交替、见证历史起落，屡次在时代转折中发挥关键力量的报人，以凛然的风骨、对民主法治及民族认同的坚持，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巍峨身影，海峡两岸称其为“一代报人的典范”。

## 一代语言学宗师徐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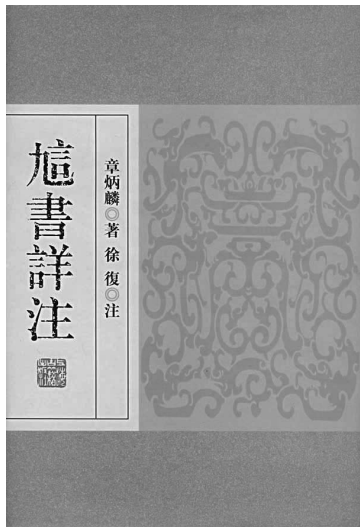
徐复（1912—2006），出生时正值清朝倾灭、民国初创，家人为他起名、取字——“复”、“士复”、“汉生”，均含“光复”之意，意在于纪念一个时代的开端。1929年，徐复入学金陵大学，跟随著名学者黄侃攻习文字学、音韵学、



徐 复

训诂学；1935年进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不久因恩师黄侃在知命之年猝然仙逝，徐复转至苏州，入学国学讲习会。国学讲习会是由一代通儒、国学大师章太炎开办并主持的，章太炎是黄侃的老师，徐复作为黄氏学生，本就是章氏的再传弟子，此番直接就读章氏门下，又成为章氏的及门弟子。徐复在章黄学派中的双重身份，显见他与章黄学派之间紧密而深切的学术关联。徐复一生以身登章门学苑为荣，且以传承章黄学脉为己任，执著而勤勉。“文化大革命”后期，“评法批儒运动”的极“左”思潮刮起，有人想利用章太炎学说为极“左”政

治服务，强拉章氏嫡传弟子徐复参加所谓“研究”《爻（qiú）书》的“‘三结合’班子”，并欲借章氏著作作为“评法批儒”的政治服务，徐复断然拒绝。他唯恐先师思想遭受曲解、学问遭受误读，决定独自进行《爻书》的校注工作，以保存先师思想、学问的本真精神与原初面目。从1975年初开始校注，至1999年最终完成，四易其稿，耗时20多年，青灯黄卷，孜孜不倦，80万字的煌煌巨制——《〈爻书〉详注》终在2000年底付梓。这不仅是章太炎研究领域的一部巨著，也是近代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



《爻书详注》

徐复终生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曾任教于国立边疆专科学校、金陵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后更名为南京师范大学）等。他一方面在三尺讲坛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培养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上长年勤奋钻研，踏实耕耘，因而收获丰硕，著作等身，赢得学界广泛赞誉与高度评价。他曾担任南京

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辞海》语词学科分科主编、《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

徐复是卓有成就的语言学家。他在语言文字研究领域的业绩与贡献主要表现在训诂学、校勘学、蒙藏语文研究、词语研究、语源学研究及方言研究等多个领域。在训诂学方面，徐复用力最勤，著述最丰，代表作有《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韩昌黎诗拾诂》等。他的校勘学研究代表作为《后读书杂记》，词语研究代表作有《敦煌变文词语研究》《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语源学研究代表作有《〈释名〉音证》等，方言研究代表作有《浔阳方言小记》等。此外，他的学术研究还涉及古代典章制度，1959年著有《秦会要订补（修订本）》，后相继结集出版《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等。

徐复晚年主持编辑、出版大型图书集成——《传世藏书》。这项文化工程由他本人提议，并亲任主编。从1990年起，数十位专家、学者在徐复的主导下通力合作，经五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在1995年推出123本、两

亿多字的《传世藏书》。这套大型图书集成的编辑、出版是传承文明、泽被后世的“义举”，也是徐复为祖国文化事业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徐复于2006年7月24日在南京去世，享年96岁。他曾说知足长乐、助人为乐、读书最乐——此“三乐”是他的长寿秘诀。论及学术研究，他曾说须有“三好”：“脑子好”、“身体好”、“坐功好”——“脑子好”是指“脑子不能笨”，“身体好”是指“身体是本钱”，“坐功好”就是“能坐冷板凳”。他一生教书育人，精研学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虽然建树卓越、德高望重，但他始终虚怀若谷，为学界所称颂。



《传世藏书》



##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吴泽

吴泽（1913—2005），历史学家，专于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历史简编》《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王国维全集·书信卷》等，有《吴泽文集》四卷行世。



吴泽

1913年1月18日，吴泽出生于武进县的一个农民家庭，2岁时父亲病故，与祖母、母亲相依为命。在亲友的帮助下，少年吴泽得以在无锡、常州就学。1933年夏，吴泽考入中国大学经济系，师从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吕振羽等。在他们的影响下，吴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经济学和中国社会经济史，并先后发表了《殷代经济研究》和《奴隶制社会论战总批判》两篇文章，直接参与了30年代有关中国社会的形态及今后往何处去的社会史大论战。

1935年，吴泽参与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不久

加入中共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卢沟桥事变后，他自中国大学毕业回乡，后因发表《从淞沪抗战看中日战争的前途》一度入狱。几经辗转，于1938年春到达重庆，先后执教于复旦大学和朝阳法学院。

吴泽学术著作益丰，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历史简编》和《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等。在这些著作中，吴泽以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为指导，在从事具体研究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相继出版了《中国社会史导论》《简明中国通史》《中国史纲》《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等，既丰富了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内容，又揭示了该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迅速发展特点。为了配合这一时期抗战宣传的需要，吴泽相继发表《中国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中国人种起源论》《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地理史观批判》等文，批判法西斯地理政治论和人口史观，表现了作者强烈的时代参与意识和战斗精神。

抗战胜利以后，吴泽携家赴贵州赤水，任教于大夏大学。1946年夏，随大夏大学回到上海，同年10月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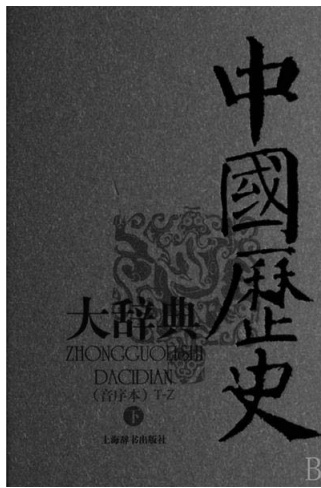
共产党。解放战争爆发后，学术思想界暗流涌动。吴泽坚持一贯的关注现实、改造社会的学术情怀，积极参与当时学界有关“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论战。发表了《孔孟的政治思想》《荀子的封建改制论》《儒教叛徒李卓吾》《保皇党的反动路线与纲领》《梁启超的拥袁与倒袁》等论文，以古鉴今，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吴泽参与接管大夏大学，历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等职。

1951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为繁荣新中国的历史研究，吴泽参与创建了中国史学会和上海历史学会，并先后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和常务理事、上海历史学会党组书记和副会长。

“文化大革命”以后，吴泽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1982年筹建并担任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会长。

吴泽学术视野宽广，勇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20世



《中国历史大辞典》

纪50年代中期，其研究重点逐步转移到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理论和古代东方史的领域。改革开放以后，又在华侨史、客家学、通俗史学等领域多有建树，其学术实践贯穿断代史、社会史、经济史、通史基本理论，马克思古代东方学，明清思想史，乡村史，神权史，华侨史，客家学，史学史等多个领域。

在学理资源和学术方法上，吴泽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坚定政治信念和浓厚学术兴趣，坚持对经济的历史考察和对历史的经济考察，主张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凸现社会经济的视角，在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凸现所有制和经济形态演变的视角，在所有制和经济形态演变问题的研究上凸现古代东方社会的视角。同时，他大力提倡将中国史放到世界史的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将历史问题带出书斋进行发展现状研究。吴泽由此得以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等人一同被誉为中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刘大中



刘大中

刘大中（1914—1975），193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工程专业，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先后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40年完成学业后在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经济学研究。1941年应国民政府

邀请，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商务参事处副参事，7月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抗战胜利后刘大中回国，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1948年任国际货币基金经济研究处专家，同时兼任美国霍布金斯大学教授、美国计量经济学计划委员会委员和美国兰德公司顾问；1958年应康奈尔大学聘请，回母校任经济系教授；1967年任康奈尔大学比较经济发展研究计划委员会主任；1970年任经济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以及经济暨管理科学数量方法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在美国期间，他兼任福特基金会研究员、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中国经济问题小组委员、美国计量经济

学会荣誉委员、美国布兰迪大学访问讲座教授、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顾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电子计算机研究经济及管理科学政策委员会委员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暨国民经济研究局计划经济学比较研究会会员等职。

刘大中在世界经济学界具有极高的声望，是享誉世界的著名经济学家。他27岁撰写《论中国的外汇问题》重要论文，并在世界经济权威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这是中国人在该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1946年他在清华执教时，首次创建中国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账户，同时还创建众多重要计量经济模型。他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与钱昌照等创办《新路》杂志，负责经济学专栏，抨击国民党时政，尤其对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失败后，给予严厉批评。胡适看后非常赏识这位年轻经济学家的才华，专门向蒋介石和行政院长翁文灏推荐，刘大中被蒋介石邀请到南京商量研究稳定金圆券方案。

1948年，刘大中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撰有《美国制造业生产函数——生产力之业际及洲际比较》等论著，为美国经济构建了多种计量经济模型。他指导的学生恩格尔日后在这个领域更是有了重大突破，获得诺贝尔奖。1965年，刘大中和叶孔嘉博士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

合著了《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由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此书成了世界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经典。鉴于刘大中在研究经济学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他的经典理论及个人传记被经济百科全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成为这部大典中惟一收录的华裔经济学家。刘大中被经济学界评论为当代康乃尔大学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经济学家，可惜这份荣誉还未来得及实现，他就因罹患癌症去世，时年61岁。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刘大中不仅对美国经济学有重大贡献，同时对台湾经济发展也做出杰出贡献。20世纪50年代，台湾国民党政府经济一片混乱，财经制度杂乱无序，经济领域学者极少，人心不稳。蒋介石为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特聘刘大中担任台湾“行政院经济部”顾问，并请他为台湾经济政策献计献策。刘大中凭着对财经理论与实效应用的独到认识，根据过去国民生产产值的毛额、投资、消费、进出口、储蓄及政府收支等统计资料及其相互依存关系，设计出9种结构方程式，推测整个经济体系将来

发展的趋势，用以辅助经济成长，同时制订了达成目标应采取的政策。这些措施，为台湾日后的经济发展引入正途，打下坚实基础，为此他在1960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三届院士。1967年又被特聘为“国家安全会议国家建设计划委员会”委员。

刘大中长期为台湾经济建设服务，致力化解台湾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出谋划策。1965年，他建议台湾成立国民收入统计评审委员会，对国民收入编算方法、基本数据来源及编算结果等进行严格审查，并提供相关改进意见，确保国民收入编算内容不出偏差。1967年，他献策对台湾赋税制度进行改革，得到蒋介石认可，被特聘为台湾“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领导



1967年7月，刘大中（左二）、蒋硕杰、顾应昌、费景汉四院士在梨山行馆和蒋介石（前排中）合影



台湾赋税改革规划事宜，主持制订新税制，研究制订赋税改革方案和拟订各项财政赋税制度，为台湾的赋税健全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74年8月，他向台湾当局提出《今后台湾财经政策的研讨》建言，主张用控制货币供给的手段，稳定物价。在倡导实施汇率制度方面，为了避免用“浮动”汇率引起“人心浮动”的联想，他主张改称机动汇率，提出经济政策要尽可能与市场供需相配合，敦促政府加速经济自由化步伐。

刘大中因推动台湾经济发展，成为奠定亚洲“四小龙”地位的重要引路人。他获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刘大中去世后，根据遗嘱，将他毕生收藏的数千册经济书籍全部捐给了台湾经济研究院图书馆，使原来简陋、藏书很少的图书馆一下子名气大增，该图书馆现被改为刘大中先生纪念图书馆。

刘大中一生撰有《国民所得表式之建立与国民所得的国际比较》《1931—1936中国国民所得初步研究》《赋税改革言论集》《刘大中院士经济论文集》等大量专著。

## 法学教育家王健

王健（1914—2007），金坛人。王健一生与法学教育同行，是德高望重、享誉中外的著名法学教育家，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捐建人。



王 健

王健幼年就读于金坛县城书院小学，天资聪慧，勤奋好学，1927年考入同济大学，后转而考入东吴大学

法学院；1938年6月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获得中国律师资格；1938—1945年在上海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执业，并先后在东吴大学、光华大学、震旦大学等校任法学教授，盛名遍及苏沪两地。

1945年抗战结束后，王健被选任为上海高等法院推事，兼任审判日本侵华战犯军事法庭法官，成为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主要成员，是当时颇具影响的上海审判日伪战犯军事法庭五名主审法官之一。

1946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罗斯科·庞德应邀来华指导中国法律工作，王健受命做协助事务，他稳重

踏实的工作作风和善思敏捷的剖析能力给庞德留下深刻印象。庞德返美后即筹资建立一项奖学金邀请王健等一批中国法学家赴美深造。1947年王健远涉重洋入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深造，获法学硕士学位。1952年王健被美国圣约翰大学聘为法学教授，便携妻儿移居美国。他边教书边学习，三年后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此后30余年王健一直任教于圣约翰大学法学院直至退休，获得终身教职职位，是在美华人中的杰出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

王健一生崇尚法学教育，虽身在海外却心系祖国法学教育事业。2000年5月，苏州大学百年校庆，80多岁高龄的王健应邀回到了阔别的母校，行走于母校故道，他动情地说：“能参加母校的百年校庆感到非常荣幸和激动，能为培养自己的母校尽力，帮助其建立中国一流的法学院一直是我多年的心愿。衷心祝愿苏大法学院未来为中国输送更多优秀的法律人才。”王健以极其丰厚的礼物回馈母校，次子王嘉廉慷慨出资1000万美元捐助父亲母校，其中650万美元在原东吴大学校园旧址上新建法学院，并以每年由美国王嘉廉基金会提供12.5万美元，在苏州大学法学院设立奖学基金，以奖励学术表现突出的教师和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促进苏大法学院与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国内外法学院、法学界的学术合作和交流。为弘扬王健爱国助学的崇高精神，苏州大学法学院更名为王健法学院，并授予王健苏州大学名誉教授，苏州大学法学院成为全国第一个由海外专项基金参与建设的公办法学院。

王健对法律的热忱和对法学教育的投入，对三子王巽（xùn）廉的影响尤为深刻，也把更多的希望寄予三子身上。王健教授在旧金山成立了王氏基金会，让王巽廉任执行董事，基金会的宗旨是致力于支持中国法制建

设和法学教育事业，这是王健的情结和夙愿。从20世纪90年代起，王氏基金会就执守诺言为中国法律建设提供各种援助。基金会与中国社科院合作，资助出版了《知识产权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已成为学界有影响力的法学文献。为加强交流，基金还出资举办了“中美欧法律暑期学院”。王健一直希望把早年东吴大学英美比较法的教育方法传承下去，因为这是让王健终生受益的教育方法。该项目2004年实施后效果明显，2005年评估报告认为该项目“国际化教育方式显著，课程涵盖的知识面广，实践性和真实感强，授课形式灵活多样”。王健听后表示：“希望大家看到比较法教育的价值所在。”

王健于纽约时间2007年12月14日凌晨因病去世，享年93岁。他在法学上的成就已深深镌刻在故土人们的心中，正如王健法学院大楼前碑铭所记：“王健教授，法学之杰”，“东吴学术，薪传无极”。

## 中国道德心理学开拓者李伯黍

李伯黍（shǔ）（1914—2010），1944年毕业于国立无锡师范学院教育系，曾在复旦大学教育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教。新中国成立后，高等院校调整，他于1954年调入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后改上海师范大学）执教，历任教育科学



李伯黍

研究室副主任和教授、上海心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心理学会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编委兼教育心理分卷副主编、《心理学大词典》外国心理学史分卷主编和上海社会心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李伯黍是我国道德心理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在国内从事儿童道德发展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中国心理学会主办的《心理学报》上发表了《教育心理学的一门新分支——德育心理学》《道德发展：心理学、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的思考》《道德认知发展研究的几个问题》等论文，开辟了我国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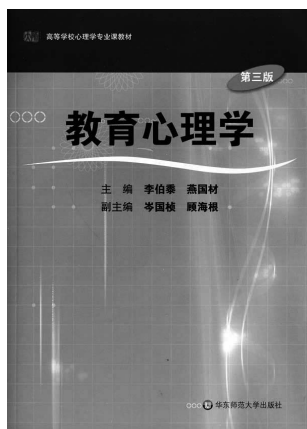
心理研究领域的先河。从1978年起，他与全国18个地区同行合作，开始对世界著名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进行系统的验证性研究，并作出客观性评价。

李伯黍在儿童心理学上有独创的贡献。他对我国4—11岁儿童和青少年学生的道德判断发展作相关研究，先后在《心理学报》等全国性权威杂志上发表了《4—10岁儿童道德情绪归因研究》《国内18个地区5—11岁儿童道德判断发展调查》《少年儿童道德行为动机特征的心理分析》《训练对儿童道德判断的影响的实验研究》《道德认知发展研究的几个问题》《西方儿童品德发展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述略》等大量论文。李伯黍致力于儿童对行为责任的道德判断和公正观念的考察研究，发现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确有顺序性和阶段性，表明儿童的道德判断确如皮亚杰所说“经历着从客观判断（依据行为外在结果）过渡到主观判断（依据行为的动机意向）的发展过程”。然而，他研究发现，中国的儿童道德判断由不成熟至成熟的观点比皮亚杰描述的要早。中国儿童4岁就能够摆脱成人影响，开始作出较多的独立道德判断，7岁儿童的主观性判断已经有了明显发展，到了9岁，这种判断已基本上取代了客观性判

断，与国外儿童相比，年龄均有所提前。在公同观点的发展上，中国5岁儿童已经具有了初步的分办公私关系的能力，作出正确判断的转折年龄在7—9岁之间。在集体观念发展上，中国一年级小学生已开始出现集体意识，根据集体的动机作出判断的比例随年龄的增长而递增。这些研究成果是李伯黍在道德心理学研究领域取得的开创性贡献。

李伯黍还专门对儿童的公私、集体、分享、劳动、爱国和利他等观念及责任心方面进行研究，发表了《行为动机与结果的匹配关系对儿童道德情绪归因的影响》《中国和西方儿童的社会行为及其社会接受性研究》等，为我国德育工作的科学化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依据，在全国乃至海外享有很高的声誉。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上海师范大学创立了第一个儿童道德发展研究室，后又会同上海市教育科学院德育研究与咨询中心筹备成立了上海市心理学会德育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任名誉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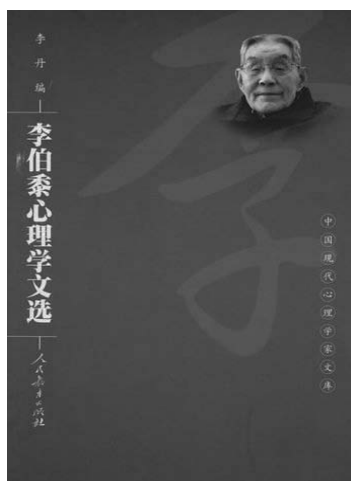
李伯黍的专著有《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社会学习理



《教育心理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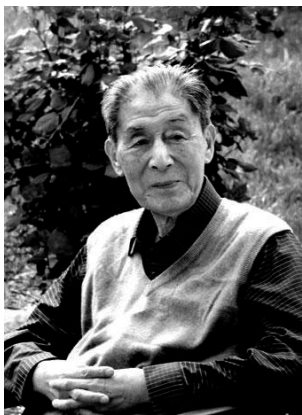


论》《心理学词典》《道德发展与德育模式》，还与其他专家合著《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2008年，《李伯黍心理学文选》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他的学生岑国桢、陈欣银、陈会昌、方文、李丹等都已成为博士生导师和国内一流的心理学家。



《李伯黍心理学文选》

## 博学大师、语言学家蒋维崧



蒋维崧

蒋维崧（1915—2006），193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任教山东大学，曾任中文系副主任、文史哲研究所副所长，同时还任山东文史馆员、西泠印社顾问、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委员、《汉语大词典》副主编、山东省语言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等职。

蒋维崧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博学之士，文学、语言文字学、书法、篆刻无所不精。1975年，中国启动最大的文字工程，组建《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调集全国10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编写。经全国推荐、筛选，确定由一位主编和三位副主编来挂帅完成这项文化工程，结果这三位副主编都落在了常州人身上。他们分别是蒋维崧、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周有光和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语言学家徐复。蒋维崧承担这份重任后，把主要精力和

心血投入到这一传承民族文化的工作上，用了十多年时间才完成编纂任务。全书正文共12部，共



《汉语大词典》

收单字2.27万个，复词37.5万个，约5000万字，并配有2000余幅插图，至1993年11月《汉语大词典》陆续完整出版。这部大词典的问世，被誉为中国词典史上一座丰碑。1994年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为中国的辞书编纂积累了经验。蒋维崧在编纂这部大词典的同时，还衍生了《汉字浅学》等专著。

蒋维崧不仅在文字学方面造诣极深，而且在艺术领域也成就卓著，主要体现在书法和篆刻上。他的从艺生涯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篆刻和行书为主，后期则以钟鼎文书法为主。

蒋维崧从小受家庭熏陶，早年喜爱书法并有了一定基础。在中央大学读书时，他又选修书法、篆刻等课程，师承篆刻大帅乔大壮教授并成为其最得意弟子，当时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徐悲鸿等都叫他刻印。22岁时他的篆刻作品就入选全国美术展览。

蒋维崧治印融会贯通，把自己研究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及秦汉篆隶等诸多古文字融入治印之中，非常注重从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文字中寻找灵感。他说：

“中国诗文里有用典故的习惯。用典故可以使人产生许多历史的联想。我们刻印也要在旧面目上增加一些新东西，让人对古代艺术形式产生联想，从而赋予旧有艺术新的内容，丰富它的内涵。”他治印追求精、雅、巧，其特点是章法高雅脱俗，刀法流畅娴熟，平和之中姿态生动，巧妙构思自然大方，清新雅洁，与殷周秦汉古典风韵有机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篆刻艺术风格，在当今中国印坛占有重要地位。

蒋维崧早年学楷书，由褚遂良、虞世南入手，基础扎实，后学行草，根植“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进又学沈尹默，最后形成自己的治印风格。他的书法刚柔、润燥结合，字形简约有法度，挺劲中露秀雅，结构平正中见流动，峻峭中透骨力，率真自然，典雅清正，具有浓郁的书卷气，给人以朴实流畅的艺术享受。

金文是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又叫钟鼎文。蒋维崧在书法上的最大贡献是开了金文书法先河。随着20世纪70年代周朝青铜器、战国、秦、西汉各个时期竹简帛书、金石碑版等相继出土，蒋维崧认为迎来了篆书

研究的绝好时机，开始投入大量精力进行金文研究和临写。

金文临写要有深厚的功力。青铜器因长期埋于地下，经历年代久远，加上人为破坏，大多斑驳锈蚀，字迹漫漶（huàn）失真，甚至扭曲变形，蒋维崧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字功力和书法水平，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器皿，以及同一器皿文字中寻求启发，尽量在恢复和保持原作风格特点基础上补充残缺、恢复原貌。这种贡献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非一般书法家所能做到。他一生临写了大量金文书法作品，大多数是鸿篇巨制。从表面上看，酷似金文原作，明眼人会发现在章法、结体、笔法、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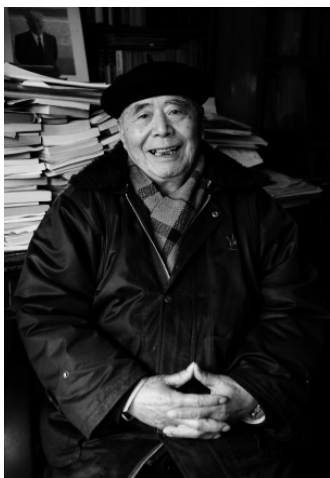


创作中的蒋维崧

韵、线条等方面他都有所独创，这源于他融古文字学和书法艺术于一体的完整继承和精准把握，其创新和研究具有历史性价值。

蒋维崧有许多书法专著，有《蒋维崧临商周金文》《蒋维崧书迹》《蒋维崧书法集》等，其中《蒋维崧书迹》共收录甲骨文、金文、小篆、古隶、行书作品114幅。

## 文艺理论家钱谷融



钱谷融

钱谷融，1919年生，著名文艺理论家，现代文学研究名家，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著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雷雨〉人物谈》等。

钱谷融天资聪颖，小学时读中国古典小说，最喜欢诸葛亮，受其影响，孩时和小朋友玩耍时自称“山野散人”。他先读私塾，后进学堂，作文一直很好，12岁时写出的作文甚至被新来的教员认为是抄袭。他不服气，在作业里以《胡批》为题撰文反驳。1937年，由于日军入侵，战火逼近家乡，不愿做亡国奴的钱谷融跟随老师一路逃难到了武汉，在国立四川中学的四川部继续读书。

1938年，钱谷融考入了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在他大学二年级时，推崇魏晋风度的伍叔愷来到国文系做系主任，与钱谷融性情相投，结为好友，经常一

起下馆子、散步。伍叔傥淡泊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性格，对钱谷融影响很大。大学里遇上不喜欢的课，钱谷融就离开教室阅读自己喜爱的小说与诗歌，但每次规定的学科考试依然过关。其间，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特征，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当大学教授。毕业之后，钱谷融先在重庆市立中学教了一年语文，1943年进入上海交通大学任国文教师。1951年由于专业调整，上海交通大学停了国文课程，他转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华东师范大学本来还想让他出任图书馆主任，被他婉言谢绝，学校只好答应他只做讲师。直到2000年，他退休时才离开校园，时年81岁。对于自己一辈子没有



华东师范大学



离开校园的经历，钱谷融解释道：“我只要有饭吃，什么都行，随遇而安。只要学校不解聘，我就一直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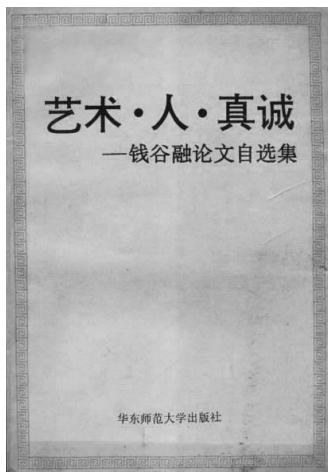
钱谷融常说，自己的学术成就是“批”出来的。这就要提到他对现代文艺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事件。1957年，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学术界思想活跃，涌现出了很多的著名作家和优秀作品。华东师范大学也在这时筹备召开一个大型学术讨论会，号召教师写论文，以展示学校的学术实力。以他的性格，本来是不愿意主动写作的，在学校的动员下，也是出于反对当时“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的文学观，他写出了35000字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他在文中明确提出反对把文艺作品描写人仅仅当作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并且指出“要改善人的生活，必须先改善人自己，必须清除人身上的弱点和邪恶，培养和提高人的坚毅、勇敢的战斗精神”。文章发表在1957年五月号的《上海文学》上。同年5月5日，《文汇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题为《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的报道，对这篇文章大加褒奖。但不久，议论和批评声接踵而至，批判这是“宣扬人道主义的货色”。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有关人员质疑他是抄袭匈牙利文艺

理论家卢卡奇的观点，还立刻要他开一个卢卡奇的批判课。而钱谷融根本没有看过卢卡奇的东西。就这样，他因为自己的文学观与主流观点不符，受到了全国范围的猛烈批判。面对这些批判的声音，他却异常的淡定，走出批判大会的会场，就和家人坐三轮车下馆子吃饭去了。

《论“文学是人学”》的风波还未平息，1959年电视上播出了吴仞（rèn）之导演的《雷雨》。钱谷融看过之后，觉得他们演得过于概念化了，与原著风格大相径庭。又逢华东师大号召和动员教师提供科研论文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这一次钱谷融与曹禺联系求证之后，写了《〈雷雨〉人物谈》一文，并没有批评导演和演员，只是阐述了自己对《雷雨》的理解。然而文章一出，教研组组长就觉得有问题，专门开了一次名为讨论实为批判的会议，请了校外同行参加，说他是宣扬人性论，是《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反动观点的具体运用。钱谷融认为自己的观点并没有错，还把文章寄给《文学评论》杂志，迎来的是更大范围、更猛烈的批判。1960年，上海作家协会开了49天的会批判钱谷融。在“文化大革命”中，钱谷融被戴上“老牌修正主义者”、“反动学术权威”和“漏网右派”三顶高帽反复被拉着游

行、批斗，后来又被发配到苏北的“干校”劳动改造，1972年，才回到上海继续教书。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钱谷融恢复了名誉。1980年，做了38年讲师的钱谷融被破格直接提升为教授，也



《艺术·人·真诚》

成为上海首位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其后，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获上海市社科优秀著作奖，《艺术·人·真诚》获上海市第四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1987年，钱谷融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终身成就奖。

钱谷融一生闲散淡泊，宽容豁达，宠辱不惊，尽管在人生道路上遭遇种种批判和不公，但依然能淡然处之。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坚持自己的秉性的，并常说“知识分子应独立于天地之间，要有独立的人格”。在文学界钱谷融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而且影响了一批人才的成长，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座丰碑。

## 近代史与经学专家汤志钧



汤志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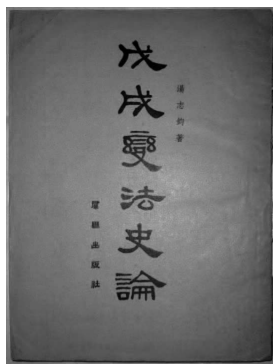
汤志钧，1924年生，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史学学科规划成员，任《辞海》编委，主要著作有《戊戌变法史》《近代经学与政治》《章太炎传》《康有为传》等，编有《章太炎年谱长编》《康有为政论集》《陶成章集》等。他还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是学界公认的戊戌变法史和经学史研究专家。

汤志钧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旧学的熏陶，由母亲教他学习唐诗、四书。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常州沦陷。第二年中学复课，汤志钧不愿意接受奴化教育，开始跟随贺怀伯学习国学，研读了《左传》《史记》《尚书》等。经过两年多的学习，他打下了坚实的国文基础。之后，他在父亲的授意下，前往当时已在上海租界内复校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习，寄住在姑母家。第一学年结束时，就取得了全校总评第一名的好成绩。第二年要分科系，本来想读文学的他，因为觉得自己诗歌不如人，而且“生性拙朴”，就选择了学习史

地，从此，决定了他一辈子与史学与经学为伴的命运。

常州在清代学术鼎盛，汤志钧受到家乡兴学的影响，也开始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当时，无锡国专有很多名教授来兼课，其中吕思勉教授的史学讲座，周谷城教授的《中国通史》，周予同教授讲《群经概论》等，都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更加坚定了研究学术的志向。为了打好写作基础，他经常到距离住所十里之外的鸿英图书馆读书，不论严寒酷暑，都坚持徒步往返。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为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第一册做注释，收集了近百万字的资料，积累了研究经学史厚实的素材。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进入复旦大学，又读完了国专未修的课程，1947年毕业。

汤志钧许多关于戊戌变法的论文和著作，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回到常州期间写出来的。1951年，他回常州任中学历史教师，并担任市历史教研组长。这时候他坚持一边教书，一边开始了戊戌变法和古文经学的研究。1953年他陆续发表关于戊戌变法史研究的论文，1955年第一本论文集《戊戌变法史论》由上海群联出版社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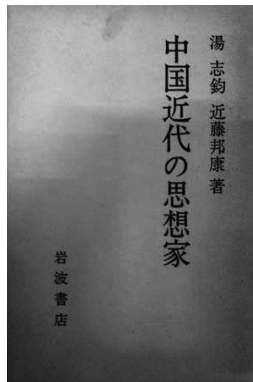
《戊戌变法史论》

版，此书集中体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对于戊戌变法史的研究成果。

1956年底，经吕思勉和周予同教授推荐，通过国务院招聘委员会的招聘，汤志钧调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任职。1958年，上海历史研究所由中国科学院改属上海社会科学院。同年汤志钧参加了《辞海》编订，协助周予同教授编写中国经学史条目，并合署发表了多篇经学史研究论文。在编订《辞海》的几年中，他还将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圈点过的《太炎文录》进行了整理和校勘。1961年完成了《章太炎政论选集》的手稿，同时他撰写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于1979年出版，此书成为研究章太炎经学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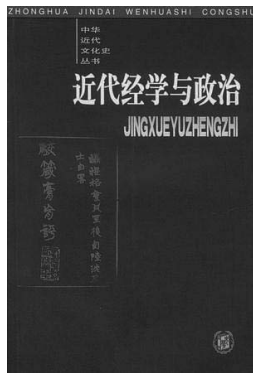
汤志钧的学术研究之路并不一帆风顺。“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为与周予同教授合撰的《博士制度和秦汉政治》《王莽改制和今古文问题》等文章被批为“大毒草”而遭到批判和抄家，还被下放工厂劳动。但他并没有因为一时的困难放弃学术研究，而是悄悄地用最简洁的文言文写了大量札记，为以后的研究打基础。直到1972年，他开始参与《宋史》的标校整理工作，逐渐回到学术研究领域。197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他被调回历史研究所，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1982年

任副所长。之后又先后赴香港中文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东京大学等著名大学讲学，与港台同胞和国际学者开展了广泛交流。1985年，他与日本学者近藤邦康合著，出版了日文版著作《中国近代の思想家》，成为了中日学术交流的重要成果。



《中国近代の思想家》

汤志钧在学术研究上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所有著作和论文都是在积累大量资料的前提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力求真实可靠，为我国的近代史和经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所著的《近代经学与政治》一书。该书介绍了经学在近代的演变情况，探讨了近代经学与近代政治的相互关系，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理论性和知识性，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1995年台湾大安出版社出版了他所著的《经学史论集》，收录了中国经学史的相关论文16篇。2011年出版的《梁启超其人其



《近代经学与政治》

书》，也是他倾近30年心血研究梁启超的最新成果，是让读者了解研究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一部重要著作。

从1955年至今，汤志钧所编写出版的著作，几乎都是关于戊戌变法史和经学的内容，这不仅是出于他本人对这一领域的兴趣，更是他治学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体现。他在自传中写道：“科学是无止境的，而人生却是有限的，只能珍惜有限的时间，坚持进取的方向。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什么环境中，只要持之以恒，我想总能发出应有的光彩的。”这不仅是他从事学术研究几十年的态度的真实写照，也是对青年学者治学方法的指导和教诲。





## 社会法学奠基者史探径



史探径

史探径（1925—2005），溧阳人，著名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专家。他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特聘教授，兼任中华律师协会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专业委员会顾问，1995年受聘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委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过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颁发的劳动法学研究杰出贡献奖。

史探径出生于溧阳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他天资聪颖加上刻苦勤奋，初中毕业后考入当时颇有名气的苏州中学。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公费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解放初期，由于建设新中国的需要，他被提前分配到工作岗位，曾分别在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劳动局工作。1958年被错划右派，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遣返回原籍，在家乡溧阳接受农村劳动“改造”。其间，他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挫败和坎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获得了平反，1979年11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

1990年史探径写作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劳动法》专著。他对劳动法的起源、劳动法的概念和调查对象、劳动法的主旨和作用、劳动法的地位和性质等劳动法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对世界劳动立法和中国劳动立法的历史进行梳理，对劳动法中的主要内容等进行独到的分析和介绍，此书获得1992年北京市劳动学会十年优秀科研成果专著类一等奖。

史探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主要起草人。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专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是劳动保障法制建设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民法制事业翻开了新的一页。史探径十分关注我国劳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率先提议，国家立法机构要提高对社会保障立法重要性的认识，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要改

进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方法等。他认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方针、任务、目标、基本原则以及某些项目中重要的关键性法制问题，都须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经广泛征求意见后反复讨论做出决定，要依照宪法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他还建议国家可以根据宪法确定的原则，制定出城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法律。由此，他主持“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国人权建设”等项目研究，参加有关人权理论、经济法理论、法律体系构建、辞书编撰等十多项重要课题的研究和写作工作。发表了《我国急需制定一部新工会法》《我国急需制定劳动法典》《中国劳动争议情况分析和罢工立法问题探讨》《我国社会保障法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社会法发展研究》等高质量的学术论文60余篇，240余万字。这些学术成果和建议得到了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相继被采纳和实施。2004年他主编出版专著《社会保障法研究》，为社会保障法学研究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21世纪以来，史探径结合自己几十年的法学研究成果，结合我国法学研究、法律工作的实际情况，完成了30多万字的专著《社会法学》。该书系统阐述了社会法

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社会法各项制度，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中的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写此书，几载寒暑，备受艰辛，不顾八十高龄。但就在大作玉成付梓之后两天，即2005年4月7日，他离开了人世。



《社会保障法研究》和《社会法学》

## 经济学家周叔莲



周叔莲

周叔莲，1929年生，溧阳人，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周叔莲在其5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持之以恒地探索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新情况，从本质上和经济规律上深入研究并回答了大量的重大现实问题。他始终站在理论探索

的最前沿，堪称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急先锋”。

在中国经济学界，周叔莲是较早论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经济学家。1975年夏秋之际，中国科学院在一份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中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四人帮”为了破坏“四个现代化”，攻击《汇报提纲》是大毒草，说马克思没有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了在思想理论界拨乱反正，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念，周叔莲系统研究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及其对生产的影响，专研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于1977年5月30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科学·技

术·生产力》一文，运用大量的论据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观点，文章受到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并在思想界引起了重大反响。此文在发表前曾由《光明日报》编辑部送胡耀邦同志审阅修改，发表后胡耀邦同志曾写信说：“……这么多的人从这篇文章中打开了眼界，明辨了是非，吸取了力量，从而能更好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这该是感到足以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一件好事情。”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周叔莲研究的重心之一。在中国经济学界，周叔莲较早地从理论上论证了国有企业有必要也有可能实行自负盈亏。他将我国国企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研究，把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他研究企业理论，提出国有企业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研究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探索国企改革目标，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国企改革研究，梳理国企改革史，研究其规律性，寻求改革出路。1979年周叔莲与吴敬琏、汪海波合写《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一文，对价值规律发挥调节作用的机制以及国有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的宏观条件提出了系统的设想，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国有企

业改革的方向，经济理论界曾经存在相当大的分歧。1988年，周叔莲在《企业改革和两权分离》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为了给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奠定更加科学的理论基础，既要坚持“两权分离”理论，又要充实和发展“两权分离”理论。

周叔莲较早提出了中国应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发展战略。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学界，有人把发展轻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等同起来，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立起来。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都不敢放手发展轻工业。为纠正这种错误的思想认识，周叔莲和吴敬琏合作于1979年8月3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一文。文章从历史和理论等方面剖析论证，认为“决不能把发展轻工业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提出在一定时期经济建设要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周叔莲的许多学术观点不断被党和国家以及经济界接受并证实其科学性和指导性。

周叔莲较早对中国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可谓中国新时期产业政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1986—1990年，周叔莲主持“七五”计划时期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中国产业政策理论研究”。他在1986年

7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重视产业政策的研究》，与人合作主编了《国外产业政策研究》《中国地区产业政策研究》《中国产业政策研究》三本专著。周叔莲特别强调，要改变过去那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管理的产业政策，应该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制定产业政策。

在经济学领域，周叔莲与时俱进，持续不断地思考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很多既有前瞻性又有操作性的观点。1977年12月，他与吴敬琏、汪海波联合署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的文章，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为工资和奖金恢复名誉的第一篇重头文章。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接着，全国开始强调实行按劳分配，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从此，中国迎来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的时期。1993年7月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一文，提出国家所有制也是一种经济手段，这一观点在思想理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

周叔莲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出版文集和专著3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主要著作有《周叔莲文



集》《周叔莲经济理论文选》  
《周叔莲经济文选》等。许多  
著作和论文获得孙冶方经济科  
学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  
秀著作奖和论文奖、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

如今，84岁高龄的周叔莲  
还依然在从事着他热爱的经济  
学工作，手不释卷。他说：

“在有生之年，我还要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活到老，学到老，努力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研究工作者。”



《周叔莲经济理论文选》

## 市场取向改革的倡导者、 经济学家吴敬琏



吴敬琏

吴敬琏，1930年生，中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国际管理学会会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改革》杂志主编。2000年12月，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评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他惟一以学者身份入选，并获得第一名。2008年，在《中国企业家》评选中，他当选“30年最具贡献的十位经济学家”。

吴敬琏生于一个有着改良思想的民族资本家家族，母亲邓季惺自幼接受现代教育，是当时的大名鼎鼎的女律师、女报人、社会活动家。母亲思想和性格对吴敬琏一生影响最大。吴敬琏自幼体弱多病，从小学到大

学，似乎总是在读书与养病之中，读书生涯断断续续的。20世纪30年代国事动荡，在战火中长大的吴敬琏，受母亲思想的影响，从小养成了具有激进的政治立场和敢于冒险的性格秉性。

1954年，吴敬琏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这是当时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第一高地。进入研究所，吴敬琏仍然是个思想积极分子，当上首任团委书记。1955年到1956年，他给苏联经济学家阿·毕尔曼当助手，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那段时间，他天天跑国务院各个经济主管部门的财务司，去抄写历年的财务报表，学习毕尔曼的苏联经济管理。1956年起，我国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他参加了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工作。

自1979年开始，吴敬琏把研究的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1983年，他去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社会政策研究所从事客座研究，研究东欧国家改革的历史和现状，奠定了他对中国经济改革作出重大贡献的学术基础。1984年回国后，他从社会科学院转到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他参与了

各个时期中国改革的理论讨论、方案的设计和决策咨询等工作。因此，他的研究成果和改革思想很大程度地促进了1992年起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为



吴敬琏接受记者采访

此，在20世纪90年代，吴敬琏被国人称为“吴市场”。首先，他坚持市场经济理论，推动市场取向改革。1978年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界和经济学界就一直围绕着改革的目标是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争论不休。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经济中“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问题，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实行经济性分权，建立市场体制。他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在80年代初期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对世界上各类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他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1992年4月，他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得到肯定。其次，他大力倡导建立健全倡导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



吴敬琏实地走访企业

场经济。他指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他最早对转轨过程中的腐败现象进行分析，揭示了“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实质，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确的途径。他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其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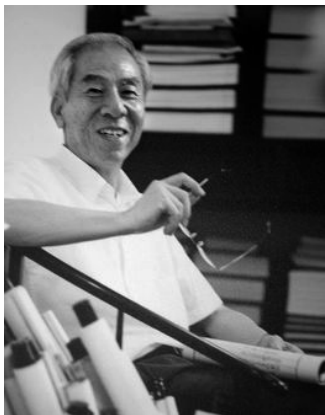
吴敬琏是当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享誉世界的经济专家。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他几乎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对转型国家的贡献和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范围。他的学识和那份独立思考、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风骨，被学界推崇。他的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被经济

界所敬重。2001年度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颁奖词这样写道：“一个瘦弱的老人，一个推动市场经济的大力士；一个保持童真和率直的学者，一个心系国家、情牵百姓的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这样评价他：“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的话，那就是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于突破体制性障碍，尽快制定总体改革方案

## 古典文学研究大家袁行霈



袁行霈

袁行霈，1936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袁行霈出生书香门第，家学源远流长，曾祖父袁绩懋（mào）为道光进士，曾历任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曾祖母左锡璇亦是位文学才女，有传世作品留存。袁家人才辈出，男辈多翰林饱学之士，女子亦才情横溢。

1953年袁行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与北大结下终身之缘。1957年毕业被林庚留做助教，之后数年和陈贻焮（xìn）一起跟随导师林庚，编著《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参与了林庚、冯沅（yuán）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的选注工作，大量的作品和史料阅读为袁行霈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7年高校恢复招生后，袁行霈在北大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陶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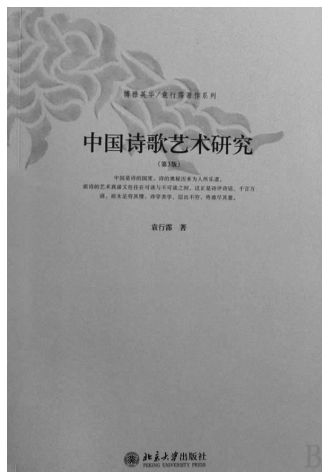
明研究、唐诗研究、李贺研究、唐宋词研究等课程。历经半个多世纪锤炼，袁行霁用心教学潜心研究，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古典文学研究大家。

1978年袁行霁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纵通”与“横通”》的文章，文章不长，却是他第一次公开表述自己的学术追求，预示着他学术道路上一个新的开始。1987年袁行霁出版专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该书被译为日文版和韩文版，被东南亚学者推崇研究，1991年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2年获国家教委授予的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特等奖。

导师林庚评价说：“行霁为学多方，长于分析，每触类而旁通，遂游刃于群艺，尝倡边缘之学；举凡音乐、绘画、宗教、哲学，思维所至，莫不成其论诗之注脚。”

袁行霁论著叠出，成果丰硕，代表论著有《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陶渊明集笺注》《中国文学概论》《陶渊明研究》《中国诗学通论》《历代名篇赏析集成》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袁行霁学术文化随笔》《中国文学史》等。其中1994年与弟子孟二冬教授、丁放教授合著的《中国诗学通论》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主编的教材《中国文学史》2001年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2002年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随着学问的精进和学术成就的积累，袁行霁的见解愈加高屋建瓴。他认为具有大家气象的学者都具备一些共同品质：其学术的格局和视野开阔，能够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处显示出总揽全局的能力；其学问都具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垂范后学；他们都是学问和道德并重，用正直、诚实、刚强成其宽容、独立之气象。袁行霁自己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大家气象的学者。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袁行霁既是学术研究大家，也是课堂教学名师，讲学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北大学子把听袁行霁的课视为一种美的享受，课后他们深有感触地说：“如饮甘霖，如沐春风，总是被深深吸引与陶醉。”袁行霁上课，教室内外几乎总是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仿佛回到民国时期名家云集的北大时代。袁行霁讲授的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等专题成为北

大中文系学子心中的经典课程。他优美的音质，潇洒的气度，儒雅的谈吐，俊逸的板书，成为北大学子记忆中的美谈。

从书斋到社会，从北大教授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都以君子般真挚仁厚的风范对待学生、同仁与下属。他带领大家一起徜徉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长河中赏珠拾贝，不懈探求，以高尚的师德、独特的情趣、宽厚的胸襟感染一代又一代学子。

1991年袁行霈获国家教委和人事部授予的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暨人民教师奖章，1993年获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1995年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



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奖章

“常怀感激之心，常存惭愧之意”。袁行霈以高洁的品性、扎实的学问践行着自己的人生追求，浸润着每一位学子与读者。

## 经济运行机制理论专家洪银兴

洪银兴，1950年生，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研究领域著名专家。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经济学院教授、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共十七、十八大代表，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第九、十、十一届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教育部社



洪银兴

会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组成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组首席专家，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会长。曾任第四、五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洪银兴对时代的发展具有敏锐的感知力。1968年中学毕业后，他到武进县新桥乡插队，对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态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也引发了对经济发展的思考。1973年，经过推荐和考试，进入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学习。在校期间，选修了经济学专业，系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党史等学科理论，为后来走上经济学研究

之路打下了基础。大学毕业后，洪银兴留校任教。1980年，考入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研究生，正式步入经济学学术殿堂。1985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的博士生，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更深层次的研究。1987年，他和卫兴华、魏杰合著的《论企业活力与企业行为约束》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同期发表的《企业行为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动力机制》获1987年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优秀论文奖——金三角奖。1988年，博士论文《经济运行的均衡与非均衡分析》作为上海三联书店经济学文库的第一批专著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年，为中央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所写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有序和无序》获得了该研讨会的优秀论文奖。

洪银兴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到南京大学工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长三角地区所面临的一系列发展问题，吸引洪银兴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经济发展领域。1990年他与林金锭合著的《发展经济学通论》被我国发展经济学权威谭崇台教授称为“将西方发展理论同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一本著作”。1994年出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书被评为教育部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2000年出版《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后经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严格评审列入研究生教学用书。1997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于200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国内最早进入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经济学著作，2002年获教育部优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

洪银兴一直关注经济转型及其秩序的研究。早在1988年他撰写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有序和无序》，就是国内较早研究经济转型秩序的论文。1990年，洪银兴在《经济纵横》上发表文章《论改革和发展相协调》，指出：经济体制的各个因素变动的速度可分为快变量和慢变量。改革可以由快变量来带动，改革的进程和速度最终要受慢变量的制约。如果快变量方面的改革过分超前，慢变量方面改革严重滞后，会使改革欲速则不达。进入21世纪，洪银兴对中国经济的探索又进一步升华。2002年撰写的《建立和规范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秩序研究》入选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此后，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市场秩序的成果，其最终成果《市场秩序和规范》列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经济学文库》出版。2005年由他申报的《转型经济学》被列入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教材是他在经济转型秩序方面研究成果的系统概括。



《转型经济学》

洪银兴对中国经济发展研究除了在理论上的贡献外，对现实的经济发展也进行了不少对策性的研究。针对国际贸易理论中占统治的比较优势理论，1997年他在发表于《经济研究》上的《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

较利益理论的缺陷》一文中明确指出，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的基础应该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该文发表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据CSSCI统计，该文的引用率进入经济学论文的前50位。2007年，他在《经济研究》上撰文《工业和城市反哺农业和农村的路径研究》指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现阶段实现三农现代化的根本出路。该文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批示。

洪银兴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同时，其个人的事业发展也迎来了一次次的突破。1988年，他被南京大学破格晋升为教授，并任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教授。1991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颁发的“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获“国家级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0年9月作为中美富布莱特杰出学者出访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耶鲁大学、霍布金斯大学等著名大学就中国的市场化和中国的经济开放作学术报告。2009年6月被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2011年10月被韩国建国大学授予名誉教授。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2013年被江苏省委、省政府授予十大社科名家称号。

洪银兴从插队知识青年、俄语专业的大学生转入经济学研究领域，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除了天资聪慧、才华横溢，更源于他勤奋、谦虚、执着，勇于创新、奋力探索的精神。

## 后 记

为彰显常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助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创建，常州市社科联策划编纂出版了“常州人系列”丛书。继《影响中国的常州人》《辛亥革命中的常州人》《文学艺术家中的常州人》《院士中的常州人》之后，现推出第五册《社会科学家中的常州人》。本册精选在国内外社会科学领域享有较高声誉的35位古今常州籍（含金坛、溧阳）社科大家，扼要展现他们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奋斗精神，展示他们在学术成果和社会上的重要成就和重大影响。

古往今来，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一定影响的常州人远不止本书中所收录的这35人，还有很大一部分社科专家学者，因资料不足等原因未被收录。今后条件成熟的，可考虑出续集。另外，段玉裁、陈济、庄存与、吕思勉、周有光、赵元任等在前面出版的四本书中已相继展示风采，本书不再重复收录。

本书共35篇。臧秀娟撰写萧子显、于敏中、洪亮吉、李兆洛；宗清元撰写谢应芳、孙慎行、赵翼、芮逸夫、凌纯声、狄超白、刘大中、李伯黍、蒋维崧；赵琴玉撰写缪钺、史探径、吴敬琏；金丽藻撰写张志让、王



健、袁行霈；陆克寒撰写徐复；张迎军撰写恽逸群、吴泽、洪银兴；陈雅娟撰写孙星衍、余纪忠；李佩菊撰写吴定良、钱谷融、汤志钧；潘晓东撰写史良、李公朴、周叔莲；钱月航撰写刘逢禄、孟宪承、谢国桢、程沧波。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委书记阎立欣然作序，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缨亲任主编并指导本书的编写。宣传部副部长、社科联党组书记丁一对本书的编写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陈满林、叶英姿、张步东、罗志平、汤继荣具体负责策划、组织、编辑和出版。虞建安、陈吉龙、张尚金、沈向阳、黄青萍、耿丽珍、李军、陈建萍、许健等参与了提纲讨论、方案修改和图片收集等工作。陈满林、罗志平最后统稿。另外，市有关党政机关、高校、新闻单位、常州市图书馆、凤凰出版社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是文史类普及读物，再加上专家大师们成就众多、学理深奥，一篇短文难以全面反映其学术精髓、成就和影响，读者可作为索引再进行深入研究。本书在征集资料、撰稿、编辑的过程中，力求最大程度地求真、求实，与传主或其后人、传人等反复沟通，充分尊重史

实。尽管如此，因历史资料、编撰时间以及编者水平等方面的局限，本书中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编 者

2013年5月





